列宁道路

LENIN

评论佳士抗争集

目录

《“列宁道路”评论佳士抗争集》序言 1

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10

佳士抗争中的所谓“道德绑架”问题及其掩盖的策略和组织错误 17

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关于 2018 年佳士斗争的思考 44

列宁道路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59

亚马逊战斗中的工联主义和佳士抗争中的冒险主义 66

拿着马列毛主义的武器走进现实——答羊肚对佳士抗争的分析 .. 79

怎么办 ——当下左翼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84

在 2022 年应该上街还是办报？ 100

为什么冒险主义者读不懂列宁 107

最初的两步——回复《简评“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 ... 117

欢迎关注 Telegram 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

《“列宁道路”评论佳士抗争集》序言

July 29, 2023

推荐给读者们的这本文集，收录了在 telegram 软件的“列宁道路”频道上发布的、与 2018 年佳士抗争有关的十篇评论。这十篇评论，从总的精神和一些主要方面反对了关于佳士抗争的“左”的和右的评价。佳士抗争有正确的方向，也有错误的策略。冒险主义者不承认佳士抗争采取了“左”倾策略，肯定了其中我们必须加以改正的错误；托派不承认佳士抗争有正确的方向，否定了我们需要从佳士抗争中继承的遗产。冒险主义者的“左”倾观点影响较大，但并没有较系统的总结，表现在不断重复的零碎发言中。右倾观点影响不大，但较系统的总结，即托派的《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却是以右倾观点进行的。之所以要对这些“左”右立场进行严肃的斗争，是因为 2018 年失败的佳士抗争，不仅是中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斗争，而且构成了此后一切新的尝试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起点和参照。现在，新的尝试已经在许多地方开始了，熟悉的现象也开始再现。例如“到工人中去”频道发布的“融工左翼如何结合斗争搞灌输”一文中所介绍的办法，就类似于 2014 年“江森十六硬汉”的模式。“到工人中去”的方式比“江森十六硬汉”优越的地方，在于有工人学习小组，并准备以小组为基础实质建党，这样就比较正确，不能说是经济主义了。当然，除了融工“厂闹”，建立工人小组还有其它的途径。在本评论集中的第二篇评论“佳士抗争中的所谓‘道德绑架’问题及其掩盖的策略和组织错误”的第四节中，我们分析了融工“厂闹”模式，指出要是没有小组和读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教育，那么这种模式就会是

隐藏着冒险主义萌芽的经济主义模式。如果不认真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左”的方式去努力，新的尝试就会重复佳士抗争中的错误；按照右的路去走，新的尝试会连佳士抗争的水平都达不到。只有总结佳士抗争中“左”右两方面的失误，我们才能在新的尝试中避免佳士抗争式的失败，才能走向胜利。

这十篇陆续发表的评论，是大致按照从理论到现实的逻辑顺序编排的，而非按照在“列宁道路”频道上发布的时间顺序编排。一些文章发表时有当时特定的目的，而这些目的现在都已经是过去式，因此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意义也消失了。打破时间顺序，按照逻辑编排，有利于读者们理解对佳士抗争的历史分析如何启发着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即如何**启发着我们去继承佳士抗争中正确的东西并改正其中错误的东西**。下面介绍一下这十篇评论如何按照从理论到现实的逻辑总结了佳士抗争中的经验、教训和对今天的启示。

第一篇评论，“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从总体上**说明了佳士抗争中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正确的经验包括：社会主义的方向，集中制的组织，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尝试。这些正确的经验是我们和冒险主义者都承认，但为托派，即佳士抗争总结中的右翼，所不承认的。错误的教训包括：“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集中制中缺乏民主。冒险主义者不承认佳士抗争中有这些错误，而事实上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佳士抗争走向失败，并且没能挽救。

第二篇评论，“佳士抗争中的所谓‘道德绑架’问题及其掩盖的策略和组织错误”，从“道德绑架”这个叛徒贺鹏超和托派都用来攻击佳士抗争中正确方向的概念入手，分析了“道德绑架”其实是道德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且用道德话语把佳士抗争中的

策略和组织错误掩盖起来了。冒险主义者不承认佳士抗争中有“左”的路线错误，于是将佳士抗争失败、组织规模缩小甚至许多地方组织完全损失的责任，归咎于贺鹏超等人的动摇和叛变。这样的归因是肤浅的，不是降低而是抬高了贺鹏超等人的历史作用，仿佛贺鹏超等人不叛变他们就能改变佳士抗争的历史似的。实际上导致佳士抗争失败、组织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是那条误导先锋队与优势敌人决战的冒险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曾在 1971 年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在没有政治自由的专制条件下，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方式，是通过若干秘密的小组的联合来创办全国政治报，再围绕着秘密政治报去组织更多的秘密工人小组并一起联合成能起实际教育、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工人政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公开非法斗争，在条件不允许公开非法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秘密活动和合法斗争，且以给予工人原则坚定的政治教育、扩大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为目标。这篇评论还分析了 2018 年导致了佳士抗争失败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从 2014 年“江森十六硬汉”那样的“厂闹”模式中蕴藏着的冒险主义萌芽发展而来的。今天要是仍然专注于“厂闹”模式中的经济斗争方面，忽视秘密出版物、工人小组和扩大组织，则会重蹈覆辙。造成佳士抗争被“左”倾路线持续统治直到彻底失败的组织原因，即为什么佳士抗争不能像长征中的遵义会议那样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纠正“左”倾路线错误，文章也进行了讨论。

第三篇评论，“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关于 2018 年佳士斗争的思考”，是一篇读者来稿。此文有较强的历史感，论证了 2014 年开始的融

工“厂闹”模式、2017 年“八青年”事件与 2018 年佳士抗争之间的发展脉落，并且提出了一些自己在佳士抗争优缺点方面独到的见解。与第一篇评论相比，在优点方面，这篇评论强调了佳士抗争中的建党历史主动性，年轻人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以及网络游击战的宣传手段。在缺点方面，作者指出了思想上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不够，以及与“左”倾机会主义相伴随的右倾机会主义等两点。这篇评论提出正确的道路“首先在于把各地小组转变成革命家组织，然后立足中国革命的特点，在重要产业和大工厂建立若干工人支部，组织工会和工人斗争，建立秘密的全国性政治报”。这样的见解吸取了佳士抗争从融工“厂闹”模式发端，接着由于融工“厂闹”模式扩大不了组织，而使得其中蕴含的冒险主义萌芽发展起来，直至完全失败的教训，值得每一位想在实践上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读者认真思考。

第四篇评论，“列宁道路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于第三篇评论的历史思考之后，在理论上论证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今日中国革命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这样我们就能将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与佳士抗争失败的过程进行对照，看看问题出在了哪里。这篇评论指出，今天中国特色黑帮进行专制统治的帝国主义特点，与列宁准备革命力量时俄国沙皇黑帮进行专制统治的帝国主义特点，有很高的**相似性**。因此列宁通过政治报建立实质存在而非形式存在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经验，对我们应有很大的启发。评论把列宁的革命道路区分为互相联系的**六个环节**：一是在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二是通过灌输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三是通过政治报建立组织上坚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四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五是在武装起义的高潮失败后捍卫秘密党并开展合法斗争，六是反对民族主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

争、在帝国主义最深刻的危机中夺取政权。现在我们处于第二、第三个环节上，应当思考列宁通过政治报实质建党的经验，这时既要反对忽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的经济派，又要反对忽视建立巩固的工人群众基础的“左”倾冒险主义。

第五篇评论，“亚马逊战斗中的工联主义和佳士抗争中的冒险主义”，对美中两个政治环境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各自有代表性的斗争进行了横向比较。美国有资产阶级民主，而中国则是黑帮专制的政治环境，这形成了两场斗争特点不同的条件。经过对比，我们认为：在工人基础方面，美国的亚马逊战斗更广泛；在社会主义方向和组织程度上，中国的佳士抗争更出色；两者分别犯了文章标题中所强调的右倾和“左”倾的错误。比较的结果，验证了列宁的下述看法：“自由主义”统治的方法容易引起右倾机会主义，暴力统治的方法容易引起“左”倾冒险主义的反应，两种错误都忽略了“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建立大而有力、原则坚定的工人组织。

第六篇评论，“拿着马列毛主义的武器走进现实——答羊肚对佳士抗争的分析”，对批评者“羊肚”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羊肚”从自己的所谓“常识”出发，指责“列宁道路”对佳士抗争的分析坚持了正统的马列主义“教条”，而这些“教条”在现实里并不灵。这反映了佳士抗争失败后的动摇情绪——它既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尚未完全改造的结果，又是佳士抗争的准备过程中缺乏理论修养提高、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尚未改造**的结果。我们相信正统的马列主义“教条”，不但要求通过刻苦的学习把什么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教条”搞清楚，而且要求用这些正统的马列主义“教条”来对佳士抗争进行分析。我们在此郑重地建议，请读者们花比如说两个

月的业余时间，细读从《列宁全集》第四卷“俄国社会党人抗议书”开始，到《列宁全集》第八卷“进一步，退两步”为止的全部文章。这样，读者们就可以搞清楚马列主义的“教条”在实质建党的问题上到底说了些什么，而这正是我们用来评价佳士抗争经验和教训最具参考价值的标准。如果读者真诚地想找到未来的道路，那么就不能依赖看起来最直接、实际上是自发的意识，而需要借助科学的工具。我们热情地欢迎读者们根据系统的马列主义的“教条”来检验我们的全部观点。

前六篇评论，主要是从总的路线和理论的、历史的角度评论佳士抗争，总结了它的经验教训。这些理论分析必然会引申出对于实际工作的看法。从第七篇评论，“怎么办 ——当下左翼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开始，我们就从理论转入了现实。这篇读者来稿强调了《怎么办？》这本书的指导意义，突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要反对三种自发性，二是要通过培养职业革命家和政治报计划结束自发性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列宁的代表作《怎么办？》被誉为“布尔什维克的圣经”；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怎么办？》，确实就能够知道如何解决“当下左翼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即自觉领导落后于自发运动的问题。作者区分了三种自发性，其中两种是右倾的自发性：未明子派的“工益”小组和佐伊 23 那样停留在线上的泛左翼宣传；另一种是“左”倾的自发性：要像佳士抗争那样“让更多工人在一次又一次冲击资本主义政府和资本家所有机构当中的行动中早点醒悟过来”。作者正确地看到了列宁对三种自发性的批判，强调了列宁所明确的任务：在没有强有力组织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不是号召发动冲击，而是建立和扩大组织。来稿所论证的培养职业革命家与政治报计划一体两面的关系，也值得读者们重视。文章最后简要分析了“融工”问题，指出“融工”本身只是一种策略而非绝对的原则，应服务于对工人进行政

治灌输的总的目的。作者对“融工”的看法和对培养职业革命家的看法，以及对整个历史和现实的看法，是互相映证且一致着的。

最后三篇评论体现了“列宁道路”关于现实道路的立场，而这一立场是和对佳士抗争的理论分析紧密联系着的。关于未来的政治路线和现实道路，我们与冒险主义者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论和分歧。分歧的实质在于：是再次发动像佳士抗争那样的冲击，还是通过政治报中介来建立和扩大组织。这一现实道路的分歧，是对佳士抗争经验教训总结的分歧的延续。“列宁道路”在承认佳士抗争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承认佳士抗争的失败，并且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不是参与者的动摇，而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相应地，在当下，“列宁道路”要求汲取佳士抗争失败的教训并继承其经验，沿着列宁的建立工人小组、利用政治报和纲领让这些小组互相接近的道路，建立实质上能够起领导作用的工人政党，而不能像在佳士抗争中那样“上街”与优势敌人决战。冒险主义者则相反，不承认佳士抗争的失败，或者不承认佳士抗争中存在“左”倾错误。由于拒绝承认佳士抗争中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冒险主义者主张继续“上街”或“又办报又上街”。第八篇评论，“在 2022 年应该上街还是办报？”，明确了双方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双方的分歧似乎包含在列宁的一句话里：

“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游行示威等上街活动——引者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

统和继承性。”（《我们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69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分歧似乎表现为，冒险主义者强调这句话的前一部分，即上街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列宁道路”则强调这句话的后一部分，即没有机关报这些活动会丧失十分之九的意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深入到对列宁一系列著作的解读上去了。和系统地学习列宁在实质建党时期的思想相反，冒险主义者对列宁著作的使用是寻章摘句式的。他们引用了许多，却理解得很少，特别是不理解列宁这个时期著作的总的精神。这些对冒险主义者的批评，构成了第九篇评论——“为什么冒险主义者读不懂列宁”——的主要内容。在理论史上批判冒险主义者对列宁误读的同时，这篇评论也指出了这种误读是与对佳士抗争经验教训的不理解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们需要在这里重复在介绍第六篇评论时的建议：那就是得花两个月时间去阅读四五本《列宁全集》，才能掌握对这些问题作出较准确回答的依据，并避免那种为了捍卫偏见而搜索只言片语、却无视列宁基本态度的尝试。

这里还需要谈到 2022 年年末的群众性民主斗争，特别是富士康工人的斗争。有些冒险主义者强词夺理，说富士康工人上街说明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有了现实的解决，即证明了上街的主张是正确的。如果富士康工人上街是有组织的力量推动的，上街行动扩大和巩固了组织，那该多好啊！可惜的是，这是自发的、改良主义性质的工人运动，而不是自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工人运动，且运

动并没有扩大觉悟工人的组织。这个事实，恰恰再次深刻说明了自发的群众运动走到了自觉的领导力量的前面，恰恰说明了当务之急不是让自觉力量像在佳士抗争那样的上街行动中消耗掉，而是让自觉力量通过列宁所实践成功的政治报道路发展起来。这样才能创造出把自发工人运动变成自觉工人运动的推动力量——觉悟工人阶层和革命工人政党，才能把游行示威的上街活动由“左”倾冒险主义做法变成扩大党的影响和觉悟工人组织的日常做法。这些观点，在“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下）”一文的第五节中进行了发挥。因为此文和佳士抗争并不是直接相关，所以并没有收入这本评论集。有兴趣的读者，从文章标题所提示的链接，或在“列宁道路”频道上，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全文。

第十篇评论，也是最后一篇评论，“最初的两步——回复《简评‘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对现实中应予努力的步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通过政治报实质建党的道路，第一步是建立工人小组，第二步是各小组相互接近，为创办全国政治报和建立实质活动的工人党作准备，而不是进行上街的群众性鼓动。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仔细分析了《巴布石金的回忆》中的一些材料，希望还原列宁进行工人小组活动这个第一步的办法。列宁多少预料到了建立工人小组、地方委员会并用政治报把它们联合为统一的全国性工人党的经验，对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探索者所具有的意义，才会让巴布石金放下作为《火星报》代办员的实际工作而去写回忆录。我们不应让列宁和巴布石金烈士 100 多年前有意识地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白费，要去用心地研究他们的经验：组织小组，充分利用刊物启发工人的觉悟，建立各小组联合的委员会，发行政治报，建立有实际作用的工人党，然后把原来小组时期互不联系、分散狭小、各自教育和组织觉悟工人的手工业方式，转变成为

有党领导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业化方式。当组织的群众基础建立起来的时候，佳士抗争中那样自觉的公开斗争，将不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而是扩大影响、扩大对工人的教育、从而扩大组织的有力手段。

愿这本评论集和它的读者们能够对这个过程有所助益。

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June 28, 2021

佳士抗争失败已经快三年了。正如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尝试一样，不同社会集团用不同的态度对待这一历史，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专制政府闭口不提，期待用沉默来让群众忘记革命，同时尽一切力量防范历史重演的苗头；自由派社会学家们用“中立”“学术”的语言回顾这段历史，说它指导思想是“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高压”，抗争方式“非法”“太激进”，无非是希望未来必将爆发的群众运动能在自由派的“理论”下，无中心地“组织起来”，进行合法改良，从而为专制制度维持统治尽绵薄之力；马克思主义者回忆这段历史，郑重地纪念它，则是为了用革命历史教育自己和群众，在未来推翻专制政府，消灭资本主义的行动中吸取它的经验教训，让重建社会主义的道路更笔直一些。

佳士抗争的正确方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最基本的方面，

表现在它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社会主义斗争。不管运动的发起者抱有怎样的目的，运动的一线参与者大多数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对改开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认识很清晰，无产阶级立场也确定不移。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错了吗？没有错。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起码了解都告诉我们，他们没有错。否认这一点，说什么特色社会主义，改开前后两个时期互不否定等等，是对常识无耻的嘲弄，是为自己脱离革命阵营进行的苍白辩解，是帮助专制政府涂脂抹粉。只要承认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雇佣奴隶地位，就必须在改良还是革命中作出选择。绝大多数的佳士运动的参与者，选择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并且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在选择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意义上，佳士抗争的方向与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上一轮革命是同样不朽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会将这样的斗士和这样的选择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不能用佳士抗争的策略错误导致的失败去否定其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方向，正如不能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因为 1905 年 12 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而说“本来就不应该拿起武器”一样，每一个想获得分析佳士抗争方向是否正确的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去读一读列宁写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见《列宁选集》第一卷）。在这篇文章里，列宁借鉴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种种错误，却肯定其正确方向的革命传统，在分析了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诸多缺点后，肯定了俄国革命者冲天的斗争精神。列宁写道：“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马克思和列宁所能理解的，专制政府的御用文人

理解不了，自由派的“社会学家”理解不了，我们却要加以理解。佳士抗争的失败，不能和巴黎公社与莫斯科起义的失败相比拟，因为广度、深度和阶段相差太多，然而我们对它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是一贯的。

佳士抗争正确方向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其集中制的组织方式。这个方面和第一个方面具有同样的真理性，但由于受到专制政府反面榜样和自由派不遗余力进行灌输的影响，思想混乱较之第一个方面严重得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整体，各个部分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其中某个部分只有与其它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保证每个部分的效果。中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于中国当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可是其用“中国化”做掩盖，任意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方法论却被广泛接受。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觉得也可以轻松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却无意中脱离了整体性，将无理论修养的状态当作一种可以接受的现实——反正以后会“中国化”掉的。这反映了一种统治集团瓦解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机制。要瓦解这种瓦解机制，非精通列宁的著作不可，因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做了比马克思、毛泽东更系统，更通俗的阐释。让我们具体回到集中制问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群众的觉悟。但群众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处于身受剥削，心予认可的矛盾状态。对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治，就需要建立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用科学的意识形态取代虚假的意识形态。工人从自己的生活条件出发，容易接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拒绝假马克思主义，开展自觉斗争。专制政府这时必须动用暴力国家机器，无产阶级这边则暴力反抗，这就需要党在教育之外还进行组织和领导。统治集团的国家机器高度组织化、

集中化。如果无产阶级的党不如此，就不可能战而胜之，前面讲的第一个方面即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便只能是一句空话。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开始要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还和列宁一起反对经济派工联主义，主张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工作需要一个组织上集中和巩固的党。列宁捍卫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论，写了一本名为《进一步，退两步》的著作分析其与孟什维克在组织观点上的分歧的始末。在这本著作的结尾，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选集》第一卷）佳士抗争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后，还坚持了上述组织方向。这也是佳士抗争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成就不大且最终失败，却仍成为改开以来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原因之一。今后的斗争，如果不坚持集中制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组织原则，那么会连佳士抗争的高度都达不到。

佳士抗争的第三个方向，是其进行了走向工人的尝试。在战场上击败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只能是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在运动的初始阶段需要知识分子集团的帮助。佳士抗争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尝试，在一些具体选择上对今后的工作也有启发意义。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发达的两个地区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这里集中了数以亿计的工人。其它地区还需要用“脱贫攻坚”建立起来的状况，在这两个地区已经由历史现成地提供出来了。佳士抗争选择在深圳这个珠三角的中心发动，而不是像北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活跃的中心发动，是经过考虑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将自觉的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结合成为统一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的愿望。尽

管尝试的结果与愿望差距极大，但尝试的方向与愿望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佳士抗争在中国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区分了两个时代：在佳士抗争之前，社会主义只是脱离工人的一种理论运动；在此之后，社会主义理论不走向工人，就不敢自称为社会主义了。值得指出的是，要是在今天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局限在象牙塔里，认为主要的目的仍然是培养和教育学生，那就是无视佳士抗争尝试的里程碑意义，是试图维持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隔绝状态的尾巴主义。

明确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走用革命方式重建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这一目的建立集中的组织并尝试走向无产阶级群众，这是佳士抗争的正确方向。佳士抗争失败了，但这是反映了上述正确方向的失败，不能因为失败就否定这些正确方向，转而投到专制政府和自由派的阵营中去。不坚持这些正确方向，就谈不到去总结佳士抗争的策略错误。接下来我们分析佳士抗争的策略错误有哪些方面。

佳士抗争最突出的策略错误，是其政治冒险主义。历史上与之最接近的派别，是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看到了群众的不觉悟，意识到了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但他们认为教育群众的素材不在群众的生活之中，而在群众的生活之外，需要他们进行诸如刺杀沙皇的恐怖行动去激励群众的斗争。列宁尖锐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指出他们将宝贵的觉悟人员用来进行政治冒险，浪费了本应用于向工人进行日常的、平凡的政治教育的力量，维持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隔绝状态，因此是和经济派修正主义同样崇拜自发性

的派别。佳士抗争希望改变政治生活一潭死水的局面，于是将觉悟力量投入一次虽然喧嚣一时但显然毫无希望的冒险，以此激荡社会的情绪，本质上和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冒险主义是一样的。实际上，在群众没有革命情绪的和平时期，需要建立政党，出版秘密政治书刊，对群众进行似乎没有任何直接效果的宣传、鼓动工作，甚至在条件最恶劣的时候也必须如此，这时言语即行动；在群众面临危机、表现出改天换地的革命情绪的时候，需要毫不犹豫地领导群众运动，将之推进到更高的阶段，这时行动本身将起到最大的教育意义，行动即言语。佳士抗争试图在群众没有革命情绪时用政治事件去创造这种情绪，结果自然是双重的失败：在知识分子这边，觉悟力量损失殆尽；在群众这边，其阶级意识未见提高。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方向，只进行了尝试，并未取得成效。当时和今后正确的策略是什么呢？答案是集中已有觉悟力量，在海外出版政治报纸，在国内建立传播网络，在各省，特别是资本主义最发达地区的大工厂里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在取得一定进展后建立秘密工人政党。佳士抗争采用集中制的组织方式，这表明其领导者应该是读过列宁的名著《怎么办？》的。此书正文共分五章，前四章讲要建立组织上巩固的党，第五章讲这个集中制的党要在全俄政治报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继续推进全俄政治报计划。从建党的行动顺序来看，全俄政治报计划才是首要的步骤。但是佳士抗争的实践表明，这个计划未引起佳士抗争领导者的足够注意。这可能与他们缺乏理论修养，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认为一些部分可以“中国化”有关。

佳士抗争的第二个策略错误，是其运用集中制原则时没有配合民主讨论。

列宁在《怎么办？》里批评了民主原则，这可能构成了佳士抗争运用单一集中制原则的一个原因。这样一来，组织内反对政治冒险主义的声音就不能在那时影响运动的方向。这需要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完整的认识。首先需要明确，集中制为第一组织原则，即使集中制的结果不佳也不能否定这一点，而民主制是第二组织原则，讨论自由不能影响做出决定后的行动一致。其次，集中制原则始终起作用，而民主制原则在组织发展起来后起作用。在组织发展起来之前，工人受到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而知识分子具备这种世界观。不能用“民主”的借口妨碍知识分子向群众灌输这种世界观。这也是列宁在《怎么办？》中反对民主制的原因。在组织具有了社会主义意识相当明确的基础之后，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倾向会随着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增强，原因是知识分子集团的生活条件脱离革命，而群众——尤其是觉悟的工人群众——能够由于其生活条件彻底革命。这时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让群众去选择领导层中的革命集团，与来自各方面的修正和动摇倾向进行斗争。佳士抗争的过程表明，其领导层斗争的彻底性不及一线参与者，但正是这些坚定的一线参与者没有决策权。坚持集中制原则，并在基层觉悟的条件下实行讨论自由、行动一致的民主程序，防止（虽不可能完全杜绝）修正主义的改良和无谓的冒险，是佳士抗争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

坚持佳士抗争的正确方向，改正其策略错误，在几年的时间内通过阅读《列宁全集》达到思想统一，准备出版全国政治报的计划，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佳士抗争的正确态度。让专制政府和自由派叹息我们的执迷不悟吧，我们会用佳士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创造出他们不愿看到的历史。

佳士抗争中的所谓“道德绑架”问题及其掩盖的策略和组织错误

August 28, 2022

一、“道德绑架”的实质是道德领域的阶级斗争

二、佳士抗争中所谓的“道德绑架”是黑帮用来压制无产阶级道德的话术

三、《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对佳士抗争“道德绑架”的不实污蔑

四、被“道德”问题所掩盖的策略错误

五、被“道德”问题所掩盖的组织错误

一、“道德绑架”的实质是道德领域的阶级斗争

“道德绑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内涵至今尚未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却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地起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用。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入了对佳士抗争的总结，让个别人得以把佳士抗争中许多正确的做法抨击为“道德绑架"，影响了今天我们在佳士抗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此，有必要对“道德绑架"这个概念进行科学分析，并驳斥那些将佳士抗争中的正确做法污蔑为“道德绑架"的谰言。

资产阶级舆论中所使用的“道德绑架"概念，由于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看似抨击道德绑架，实则进行着道德灌输。在百度百科中，道德绑架被定义为：

“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

在资产阶级的“学术期刊”中，虽然有争论，但相互之间的差别以及与百度百科的差别都不大。得到较多引用的一个定义认为：

“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道德绑架内涵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 期）

在这些定义里，既没有谈道德的阶级性，也没有谈道德冲突背后的阶级冲突，有的只是对“道德绑架”的抽象否定。至于被否定的“道德绑架”概念中的道德是哪个阶级的道德这一问题，并没有出现在这些讨论的视野里。我们不妨看看这个被掩盖的问题。在前文所引的那篇《道德绑架内涵探析》文章和百度百科里，都举了这样一个“道德绑架”的例子：吉林贫困农民刘福成有个 11 岁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为治病花光所有家产且向亲友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他向网易老板丁磊等六位国内富豪写信并登在了报纸上，希望他们捐钱给自己患病的女儿治病。这位贫困父亲的求助在舆论上造成了“胁迫”富豪的结果，竟然有两位富豪因此捐了款，贫困父亲的无奈之举就被“学者”们指责为“道德绑架”。这里“道德绑架”之争的实际阶级内容，并不是贫农在道德上支配了大资产阶级，而是恰恰相反，是大资产阶级及其学者试图在道德意识形态上控制贫困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小资产阶级接受自己因资产阶级的贪婪掠夺造成的悲惨命运，而不要去打扰富豪们的安宁。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

作为应急方式向统治阶级中的个人求助的做法。列宁的党甚至向英国资本家借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直到革命胜利后才还钱给资本家的后人，因为超过约定的还款时间过长，那位资本家已经去世了。但需要指出，将向富豪救助作为一条路线就完全是幻想了。劳动者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只有通过推翻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实现。仅仅在道德上“绑架”大资产阶级是不够的，首先还必须在政治上“绑架”他们，这和建立劳动者专政是一个意思。

“道德绑架”反映着现实中的道德冲突。这种道德冲突，如前所述，可以是不同阶级之间道德的冲突，例如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同一个阶级不同道德主张的冲突。例如在 2015 年 9 月 3 日上午，黑帮为了营造民族主义舆论，进行了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阅兵。一众靠着生产精神毒品为生的影视明星都转发了有关阅兵的图片、视频，而这一天台湾女星范玮琪则继续在网络上晒自己的双胞胎儿子，范因此遭到了网络围攻。这一事件也常被作为“道德绑架”的典型案例来讨论。实际上，无论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意识形态，都是黑帮的道德武器。只不过，在黑帮准备战争时，常常是前者压倒后者；而在通过纪念战争强化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压倒前者。今年被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特别推崇的《永远的〇》这部电影，就是表现家庭意识形态支配民族主义的典型。这种披着“道德绑架”外衣的统治阶级道德内部的冲突，对于多数劳动者，特别是工人来说，是道德洗脑的不同表现。它们的区别并不大，就像枪决和绞刑的区别不大一样。

马克思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98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也服从唯物史观的这一规律；具体而言，就是在特定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通常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所谓“道德绑架”的批评往往在实质上是隐蔽推销、强行灌输统治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理念。恩格斯曾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说明要唯物地、历史地、阶级地分析道德。他说：

“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未来利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35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恩格斯的结论提示我们：如果工人阶级能够用一套自己的道德理念去对抗资产阶级的道德，如果统治阶级需要为自己的道德进行辩护，如果统治阶级高喊不要进行“道德绑架”，那么这恰恰说明工人阶级此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列宁更进一步地指出：

“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89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这里面蕴含的意思是：不能消极地等待无产阶级道德自发成长起来去代替

无产阶级中间流行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影响，而是要由先锋队自觉地用无产阶级道德去灌输无产阶级群众，用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付出自己个人一切的道德意识，去激发出勇于与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进行彻底斗争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只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有刻骨的仇恨，只了解要建立革命政党来教育和组织工人用暴力推翻现政权这条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还不足以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除了这些之外，还须具备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把服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要求作为自己自觉意识的人，才是真正的先锋队成员。

二、佳士抗争中所谓的“道德绑架”是黑帮用来压制无产阶级道德的话术

我们来看看对佳士抗争中所谓“道德绑架”的批评。在佳士声援团官网上，曾经公布过一份认罪视频的文字整理。曾是佳士抗争领导者之一的贺鹏超这时已经叛变。他在认罪视频中说：

“我们这个组织也认为，学习是搞资产阶级学术，学了就是注重自己的私利，（讽刺不屑的语气）不愿意奉献，用这样的**道德绑架**让学生们放弃自己的个人前途呀，自己的个人私利，甚至家庭，爱情。

而且这个组织还有一点，个人的恋爱情况也要汇报，不允许和组织外的人谈恋爱，谈了也要分手，即使是组织内的人，也要经过组织审查，向组织汇报，聊天内容不能避开组织，没有一点自己个人的隐私。”（“道德绑架” 一词的黑体为引者为了方便读者查找所加。）

在承认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录像中，投靠了黑帮的贺鹏超用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去攻击自己曾经施行的正确的东西。学生不放弃自己去当资本主义螺

丝钉的小资产阶级前途，不放弃自己评黑帮奖评黑帮优的私利，不为革命放弃一定会被黑帮用来要挟自己的家庭，不放弃把自己往黑帮和资产阶级那边拉的旧恋人，他怎么能够变成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呢？不用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去“绑架”、去排挤、去代替资产阶级社会处心积虑灌输给他们的旧道德，他们又怎样能放弃这一切呢？在道德问题上，不是资产阶级道德通过所谓“道德绑架”的话术战胜无产阶级道德，就是无产阶级道德揭露、“绑架”、战胜资产阶级道德。在这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黑帮处心积虑炮制的认罪视频中，为了呼应叛徒贺鹏超的论点，让他攻击革命的“道德绑架”之说能够有证据支持，还专门加进了另一个曾经立志于投身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后来却告别了革命的女学生侯长珊的呼应之辞。她说：

“我从小和我的家人感情特别好，但是组织说，家庭是什么封建束缚，亲情是面具，实际上有利益的考量。感情上我才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哭了），我和我的男朋友就是因为他们才分手的，当时贺鹏超逼着我给李仁钦（前男友）发短信，在旁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输，‘永无复合可能，再不见面’，说要彻底批倒批臭*他这个投机分子。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告别革命之后，曾经放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舒适生活的做法，自然就显得很可惜了。马克思说：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98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在佳士抗争中，黑帮针对革命学生的首选恶毒招数，就是把父母喊到现场劝自己的孩子回去，借家庭要挟、分化学生。在感情上不“受害”，不自觉把自己“道德绑架”一下，就挺不过黑帮这第一轮迫害。革命爱情和革命家庭是革命道德的体现，会让黑帮的这种迫害无功而返。革命青年应该寻找革命爱情，就像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那样。而他们的爱情，某种意义上恰恰都是在“组织内”找到的。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做些解释，那就是贺鹏超谈到的学习问题。他把否定学习看作“道德绑架”。那到底要不要学习呢？答案是有的不要学，有的要特别认真学。不要学的是贺鹏超自己曾经正确地否定的资产阶级学术，要特别认真学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学生，以及较少受到资产阶级学术影响的工人而言，清洗自己身上的旧意识形态影响时，总体上否定资产阶级学校的生活和痕迹，是成为革命者的必要步骤。另一个必要的步骤则是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这是树立科学世界观的唯一途径。没有系统世界观的人无法稳定地参加政治活动。没有系统科学世界观的人也无法稳定参加革命活动。没有道德和立场的教育不行，但像佳士抗争的准备过程那样，只注重道德和立场的教育，而没有系统科学世界观的教育，结果很多参与者，包括贺鹏超本人，都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其次，不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极其容易犯路线和策略错误。佳士抗争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贯彻了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行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宝贵尝试，但却不知道要利用政治报刊和工厂支部去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把那个能够推翻黑帮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用自己的日常活动创造出来，结果在策略路线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让先锋

队与优势敌人进行了决战。（这个问题第四部分还会详细谈。）贺鹏超还是一个革命者的时候，他否定资产阶级学术的历史是不错的，但这个不错的历史是和忽视科学世界观教育的错误夹杂在一起的。我们相信，很多佳士抗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离开了政治活动，不仅和他们的立场、他们的道德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有关系，也和他们没有深入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因缺乏修养而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策略路线，陷入已经竭尽全力却无力改变失败的困局有关。

三、《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对佳士抗争“道德绑架”的不实污蔑

署名“清道工”的《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是一份传播较广的对佳士抗争的总结，但却是一份极其糟糕的总结。《备忘录》罗列了27 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一个笨蛋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多得多。我们只能选择两个与所谓“道德绑架”相关的方面做点分析。《备忘录》称佳士抗争是：

“力图裹挟工人大造声势的一场政治投机冒险运动”（第 14 页，原材料未编页，页数为引者所编，pdf 文件的首页为第 1 页，原材料在 google 上很容易搜到）；“‘道德绑架’，很可能是佳士运动主导组织原有的组织特点”（第 44 页）。

这两个方面，前一个涉及到佳士抗争的总体性质，后一个方面涉及到佳士抗争中的“道德绑架”问题。《备忘录》将抗争定性为“政治投机冒险运动”，与我们在肯定其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批评其“政治冒险主义”路线策略错误的看法，似乎只有“投机”二字之差，实则是根本否定和原则肯定的性质差别。为什么应

该原则肯定佳士抗争呢？这就需要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这场抗争的方向是改良还是革命？第二，如果是革命的话，如何看待抗争中出现的相当多的原则性动摇？第三，如果是革命的话，如何看待贺鹏超等人的叛变？

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是对佳士抗争进行定性的核心问题。贺鹏超和宗扬两人在认罪视频里即使背叛了革命，但并没有否认自己过去要革命。贺鹏超说：

“学会的学习都是围绕文革逻辑展开的，让我们觉得前三十年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走资派掌权的过程。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重新建立社会主义。”

宗扬说：

“我是大一的时候加入了北大马会，因为自己本来有些激进思想，进去马会后就更加认同极左思想，觉得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回到社会主义。”

郑时友说：

“我加入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这个党在类似纲领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中已经声明：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郑时友承认自己加入了这个党，应当理解为他要造反动统治集团的反、革反动统治集团的命。这三个佳士抗争的重要组织者都确认了他们要通过革命在中国重建社会主义，是在这个总的方向下发起了佳士抗争。佳士抗争的一线参

与者当时又是一个怎样的思想状态呢？是主张改良还是革命呢？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他们大多和前两个组织者一样，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培养出来的，他们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参与了佳士抗争，而且在被捕之后总体表现得比组织者更好。佳士抗争的主要力量，即其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革命立场，是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的直接根据：

"不能用佳士抗争的策略错误导致的失败去否定其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方向。"（《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可惜的是，抗争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动摇，主要表现在向黑帮中央和首脑的呼吁上。像《声援团代表岳昕致中共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信》这样的与上一段讲到的革命立场背道而驰的声明，在声援团的官网上可以用比比皆是来形容。这无疑既会极大削弱抗争本身的政治教育意义，也会因为没有统一的原则立场削弱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备忘录》用抗争中的原则性动摇这个方面去否定抗争的革命方向这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作者强烈的政治偏见，还遮蔽了这样一个需要解释的矛盾：天壤之别的两个方面为什么会结合在佳士抗争里？原因首先在于缺乏修养，不能用系统一贯的理论立场去支撑原则的坚定性，不知道正确的路线方向需要一系列的组织原则和策略方法去保障。应该在理论上就放弃的做法，却只能在实践上一再尝试失败后才放弃。声援团自己在11.9大抓捕之后的反思中就已经意识到：

“想象一个策略来避免国家和资本的破坏与打压的运动是不现实的、过于天真的”，“应该放弃对所谓开明上层的幻想……冲撞警察、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佳士运动的争论与反思》）

此文从革命方向出发反思策略的错误，映证了我们关于佳士抗争中社会主义革命方向是比原则性动摇更根本的方面的看法。

社会主义革命方向与原则性动摇纠缠在一起的第二个原因，是幻想不通过路线策略的斗争就统一所谓“左派”的愿望。这种愿望，甚至在刚才提到的反思文章中仍然表现得很明显。工人阶级革命派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产生出来，在起步阶段势单力孤时有联合的愿望很自然。列宁在划定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小组的范围时，排除了否定社会主义目标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但把经济派划了进去，原因不在于经济派的斗争手段，而在于经济派的斗争目的。列宁后来与孟什维克等派别也有过联合的尝试，但在这些尝试中列宁始终坚持着自己在方向、组织、策略等原则上的系统一贯性。在与这些小资产阶级派别联合的愿望上，佳士抗争的领导者与列宁并无区别；在是否坚持原则的系统一贯性上，佳士抗争的领导者就与列宁有极大的差距了。为了获得这些“左派”的支持（事实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原则性的让步和动摇就发生了。

署名《备忘录》作者的清道工在批评佳士抗争中所谓的“道德绑架”时还胡说什么

“……佳士运动的多数积极分子是多么脱离群众……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官僚机器，旁观群众一直搞不清究竟该对谁反馈意见才会有效果……”（《备忘录》第 45 页）

清道工这个“旁观群众”提了什么高明的建议呢？

“工人阶级因为大工业的兴起而聚集发展，其社会生活、组织性和斗争性的水平有自己的发展动力，左翼或其他 NGO 即使不介入，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水平也会自行发展。”（《备忘录》第 18 页）

一个连经济派都不如的货色写了 117 页的材料攻击、污蔑、抹黑佳士抗争，然后提出了旁观到底的建议！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为什么佳士抗争的参与者以至组织者，不仅没有接受类似这样“旁观到底”的“反馈意见”，甚至内心里面对之有多么鄙视。贺鹏超、宗扬确实认罪了，做了可耻的叛徒，我们对此坚决批判，也绝不原谅，但他们毕竟革命过。像清道工这样“即使不介入”的白璧无瑕者，从不革命，自然也就不会叛变了。原则性动摇的建议不仅来自清道夫这样的攻击者，也来自像“怀火”网站这样的同情者。不能因为多数建议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恶意的而对所有的建议都不加理睬，也不能因为原则性动摇的建议来自同情和支持者就加以接受。唯一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一贯的原则和实际情况来进行甄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而不是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接受建议甚至结成联盟，同时也准备着联盟的破裂。由于缺乏修养，由于过于迫切的建立“左翼”联盟从而推动抗争的愿望，佳士抗争表现出了强烈的原则性动摇。这样的动摇，在下一次沿着佳士抗争正确方向上

的斗争中不应该再次发生。

第三个问题是叛徒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了，虽然有工人米久平、学生徐忠良等并没有认罪的同志，但像贺鹏超这样在佳士抗争中曾经威望很高的领袖背叛了革命。有多达十几个人录了认罪视频，当时批判了他们叛徒行径的邱占萱、展振振后来也跟革命告别了。那能不能像《备忘录》那样，据此就倒推回去，把佳士抗争说成是"力图裹挟工人大造声势的一场政治投机冒险运动"呢？在对这个判断做出否定的回答和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列宁，是如何对待那位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

列宁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彻底否定、批判考茨基的叛徒言行；二是肯定他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著作是

"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6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肯定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功劳；三是根据考茨基后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结局，去回溯他在取得那些成绩和功劳时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动摇，说明最终的背叛由以发展起来的历史线索。在考茨基没有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主义之前，列宁并没有强调这些动摇的表现。也就是说，列宁并没有因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较小的程度上）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去完全否定他们过去光荣的历史和他们所领导的斗争本身。

我们应该借鉴列宁的态度，去评价贺鹏超等叛徒的功过，既不文过饰非，

也不以今非往。第一，我们彻底否定、批判他们这些人的叛徒言行，而且要加强革命气节教育，把“道德绑架”更深入一步，同时建立革命者完整的世界观，让先锋队的成员们有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去面对考验。第二，我们肯定这些现在的叛徒过去曾经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做出过贡献。而且为了做出这些贡献，他们在那时做出了许多个人的牺牲。声援团官网曾有题为《贺鹏超——那只翱翔天空的雄鹰：翱翔蓝天，浩志长存！》的报道。报道说，贺鹏超常去工地和工人交朋友，去工人居住的地下室拜访工人，一开始工人都不敢相信著名学府的天之骄子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不仅拜访工人，还参与工人的斗争，为了替被不公正对待的学校保安讨回公道，甚至遭到过保安公司老板的殴打。《备忘录》对贺鹏超们裹挟工人的指责，更是基于作者自己偏见的想象。佳士抗争之前形成的“厂闹”经验，事实上是由于组织内具有影响力的一线的积极工人的支持，才成为佳士抗争冒险主义策略的基础。不是工人出身的人则难以坚持反对意见。（这个问题第五部分会进一步分析。）贺鹏超曾作为北大山鹰社的组织者之一受到两任黑帮总理和北大校长的接见。他不去黑帮那里投机，却跑去找激进工人投机，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无论是贺鹏超，宗扬，还是等着一个台阶下的邱占萱、曾经有过自焚抗议想法的展振振，都缺乏足够的修养去把革命引上正确的道路。在穷尽了个人和小组的力量后，他们的信念崩溃了，做了可耻的叛徒。但这不应抹去他们曾经进行过的斗争中那些无私无畏的方面。如果无视这个方面，“即使不介入”先生们就会借机把佳士抗争正确的方向否定掉，为了自己旁观到底的丑行能够心安理得，不惜保持工人的自发状态。这也是我们费了叛徒所不应获得的笔墨的原因。第三，在这些后来的叛徒领导斗争的时候，

他们之所以会深陷政治冒险主义，或多或少都与最终取代了革命信念的私心杂念有关。在 2018 年 8 月 24 日清场之前，有许多建议撤退、保存力量的正确声音，但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除了理论上修养不足而难以批判哪怕是受到激进工人支持的政治冒险主义，除了经验上欠缺而未能判断建议是否合理等因素之外，认罪视频中提到的“个人的私欲”也妨碍了找到如果是完全无私无畏的斗争所可能寻得的道路。

“道德绑架”这样的叛徒言论和拾叛徒牙慧的《备忘录》，总会一再出现。英雄的阶级及其先锋队鄙夷叛徒对革命的悔恨之辞和“即使不介入”之流的诛心之论，在理论上批判他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集中制原则和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将“道德绑架”，即无产阶级解放的道德教育进行到底，那个改天换地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一定会被创造出来。

四、被“道德”问题所掩盖的策略错误

即使有正确方向和许多正确做法，佳士抗争还是遭遇了惨重的失败：秘密的组织力量，公开的声援团力量，相关各高校的学生社团，几乎都损失掉了。这些力量，直到四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恢复起来。这有客观的原因，比如说群众觉悟不够、敌人强大等等。这就需要采取既符合原则、又适应客观条件的策略路线，以及保证正确的策略路线能够出现并取代冒险主义策略路线的组织路线。列宁指出：

“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是“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怎么办？》，《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38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无论是争取还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都只能依靠工人的觉悟和基于觉悟的组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队伍越大，革命和继续革命才越有力量。工人的觉悟只能通过持续系统的政治教育，因此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构成了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与革命高潮时期以行动示范为主要方式进行政治教育不同，在革命准备时期，政治教育的基础形式是向工人提供思想材料。而没有全国政治报和以全国政治报为脚手架组织起来的工人政党去进行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能让这种基础形式真正起到基础作用，工作就不能有持续性和继承性。秘密中央，秘密出版物，秘密的各地支部组织的工人学习小组，是进行持续的、有继承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物质力量。列宁说：

“这位彼得堡人强调必须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必须研究新的问题，必须用一切办法鼓励和发展学习小组，这些小组可以从工人中间培养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领袖，——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方面，党**支部**的作用特别大，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职业革命家’也应当起新的良好作用。”（《关于两封来信》，《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270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如果不愿意去做这样长期的言即是行的政治教育工作，不愿意去耐心地改造工人的头脑，而是试图用发动脱离工人思想状况的斗争去“培养”工人的觉悟，就是一种政治冒险主义。这和沙俄时期的社会革命党想用刺杀沙皇及其官员的方式去激荡群众情绪的政治冒险主义一样，不能起到真正政治教育的效果。

佳士抗争中的政治冒险主义，从“厂闹”模式中的冒险主义倾向发展而来。

“厂闹”模式的做法，一般是以三个月为周期，先调研筛选一些合适的厂，然后派人进厂，伺机鼓动工人闹事，看能不能从闹事工人中发现和培养觉悟的革命者。2014 年的“江森十六硬汉”即是“厂闹”模式的代表性案例。在选定了湖南长沙广汽江森汽车内饰厂后，3 个人进厂，边上班边观察等待了一个多月，看到群众自发经济要求后发起了罢工。估计罢工中有骨干分子 19 人，随大流 25 人，动摇分子 16 人，一共 60 人，结果最后坚持下来的有 16 人，因此得名“江森十六硬汉”。这十六硬汉中，除去作为发起者的 3 个人外，涌现出来了 13 名工人。这 13 名工人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也有本来就不想再在江森厂继续呆下去而跟着闹的。但这次“厂闹”毕竟涌现出来了 13 名工人，从数字上来看，三个月就从 3 个人增长到了 16 个人，增长了好几倍。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去几何增长，那么让工人阶级觉悟起来似乎就很快了。但这种“厂闹”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事实上并不能将比如说江森厂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这 13 名工人看作觉悟了的工人，因为他们虽然在罢工斗争中受到了一些教育，但这些教育和那种能够较彻底地改造世界观的、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这 13 名工人，也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罢工，就转变成像那 3 个发起者那样的、能够持续进行革命工作的火种。“江森十六硬汉”的这次斗争，偏离了觉悟者办全国政治报、建立秘密组织后对工人进行各种形式政治教育的大道，但其冒险主义只能说是可能倾向，因为发起者控制了斗争的程度。为了不暴露自己，3 人小组只提了兑现原来承诺的全厂每人 1200 元补贴以及每月加 300 元底薪的经济要求，并且有意没有去做 60 人中剩下的 44 人的工作，以免事情闹大引起黑帮警觉，然后就准备进下一个厂了。（这些人数都是为了说明情况所编的，真实数字出于安全

方面的理由不便公开。）

“厂闹”模式其实是经济主义的工作模式，冒险主义只是隐藏在其中的一种倾向。“厂闹”模式如果发展成先锋队直接向优势敌人进攻，比如 3 人小组直接向警察进攻，就转变成了冒险主义。列宁已经透彻分析过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在那时表现为暗杀的恐怖主义）分别崇拜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自发性，批评两者都没有发挥自己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自觉性：

“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怎么办？》，《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74、75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佳士抗争是秘密小组发动“厂闹”这一模式的升级。2016 年佳士工厂即被选中作为工作对象，到 2018 年发起佳士抗争，秘密小组工作的时间比“江森十六硬汉”中的三个月要长了很多。可是因为没有利用政治书刊，没有工人学习小组等政治教育组织，能够响应秘密小组号召的工人基础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018 年 4 月，秘密小组发起了反对“佳士十八禁”等苛刻厂规的斗争，并在 5 月提出了组建佳士企业工会的要求。到了 7 月，7 名建会积极分子（可以理解为“江森十六硬汉”中那样的秘密小组的成员）均被佳士工厂开除。他们向厂内工友的呼吁，去工头所安排的安抚工人的饭局上散发的传单，都没有得到厂内工

人的响应，证明了之前的群众政治教育工作效果不佳。7 月 20 日建会积极分子在佳士厂门口要求复工、建会并被警察抓捕，就已经是先锋队脱离群众、独自决战的冒险主义做法了。后面的声援活动，特别是脱离工人的学生声援团的抗争，既是佳士抗争的高潮，也是冒险主义的顶峰。这条“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路线，葬送了本来就不大的组织力量和群众力量，让本应用于大规模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力量丧失了。

在佳士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 8 月 24 日清场和 11 月 9 日的大抓捕之后，就有参与者提出这是一条类似王明路线的“左”倾路线的实践。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左”倾，结果既造成了红军被迫退出苏区，也造成了白区工作的几乎完全损失。佳士抗争中的“左”倾冒险主义，无论是路线的“左”倾实质，还是结果的惨淡，都与王明“左”倾路线类似。如果能够把“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纠正过来，无论是组织的力量，还是觉悟群众的力量，都可以发展壮大。但这样的看法以及一切对佳士抗争中策略路线的错误的正确批评，和来自类似清道工《备忘录》那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批评一起，都被冒险主义者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向革命的进攻，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而全部予以拒绝。策略路线的争论被道德化，被“道德绑架”掩盖起来，从而难以发展。不进行路线争论，“遵义会议”也就不能发生。

王明的“左”倾路线是从批判李立三“左”倾路线中发展起来的。李立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在党内反“右倾”，批评毛泽东有保守观念。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已经向“左”边偏离了正确路线，而王明却批评李立三

是"左"表右里，还不够"左"：

"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反对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立三同志等隐藏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一齐胜利的'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断送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115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

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王明也同样批评李立三"左"倾的路线使党落在了群众的后面：

"尤其重要地好些地方党部同志对于职工运动，多半没有过经常刻苦深入的系统计划工作，时常成为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今年某厂有斗争，便上自上级领导同志，下至整个支部都出马到这一厂，明天另一个厂有斗争，又是一齐出马跑到另一厂里去，斗争一完，大家又把这个厂放弃了。"（同上，第125 页）

李立三在城市工人运动中过"左"、缺乏长期系统的工作，是事实。王明反"左"的结果，是让一条比李立三更冒险、更完备的"左"倾路线统治了党。毛泽东思想不得不在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毛泽东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看法，在"左"倾冒险主义看来，可以说是相当"机会主义"的：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

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340、341 页，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毛泽东强调在工人运动中要认真进行秘密工作，要利用合法机会以保全和积蓄力量，与列宁关于在革命准备时期言即是行的主张实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毛泽东和列宁都是“怕”字当头，但“怕”革命力量遭到损失，怕把党和群众力量闹个精光，并不可耻。相反地，因为冒险主义而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才是可耻的。

在中国上一轮革命中，如果“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直持续下去，那么革命走向胜利将是不可想象的，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也将长久地稳固下来。“左”倾冒险主义形式上最激烈地反对反动派，但实质上却违背他们主观意愿地在帮助反动派。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上一轮革命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正确策略路线并最终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而在佳士抗争中却没有？

五、被“道德”问题所掩盖的组织错误

毛泽东曾经公开讲过，他受列宁影响比受马克思恩格斯影响要多一些。我们能从列宁那里学到的东西，比毛泽东能从列宁那里学到的东西，应该还要多。列宁处理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

处理的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像列宁那样通过全国政治报建党这样的做法，对毛泽东几乎没有借鉴意义，而对我们则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毛泽东所特别重视的列宁思想，是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斗争。他在 1932 年率红军占领福建漳州时，在漳州龙溪中学的图书馆中得到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是列宁分别与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自己读了多次，还推荐给其他人看——这与佳士抗争的准备过程中反对大家读马列著作是何等不同。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先要他看《两种策略》，后来又要他看《"左"派幼稚病》：

"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自述》第 183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彭德怀所回忆的毛泽东荐书这件事发生在 1933 年秋天，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而到了 1934 年"左"倾冒险主义就使得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陷于失败并被迫长征。毛泽东此时已经受到"左"倾中央的多轮打击和排斥，跟彭德怀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是有感而发。他已经从临时中央多次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军事路线上切身体会到了"左"倾冒险主义葬送革命力量和前途的危害，列宁的著作则让他从经验中得到的认识因有理论的支撑而深化了。如果毛

泽东没有下相当的功夫去读马列著作，没有这样的理论支撑，那么他就会像1927 年自己面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那样，虽然从实际中看到了党因为放弃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而面临反革命政变的危险，但这种观察只是一种朦胧的认识，他还不能从理论上去确认自己观察的正确，也没有自信去坚决地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纠正错误路线。佳士抗争在准备力量的时候，如前所述，在正确地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同时，错误地反对同志们认真地研究马列著作，导致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了佳士抗争并造成严重损失的时候，大家最多也只能有类似毛泽东在 1927 年那样朦胧的认识，而不能像毛泽东在 1933 年那样清晰地看到路线错误的实质、系统地说明错误路线的各个方面表现并自信地与之进行斗争。

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之所以能够战胜第三次“左”倾路线，除了因为正确路线成功地进行了前四次反“围剿”而让许多人认识到了其正确之外，还受益于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原则上的保障。路线错误必然伴随着宗派主义的组织错误，因为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总是要排斥反对自己的干部。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也伴随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但总算守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底线。他们把毛泽东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追查“邓、毛、谢、古”的“小组派别活动”，但并没有把毛泽东开除出党。毛泽东在王明博古“左”倾路线支配中央之前的六届三中全会（1930 年）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支配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1931 年）上仍旧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第三次“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六届四中全会（1934 年）甚至还转正为政治局委员，否

则毛泽东可能连参加遵义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了。毛泽东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宗派主义的组织方面可以说深恶痛绝：

"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6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批评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组织方面的这些表现，不同程度地在佳士抗争中也存在着。在佳士抗争的准备过程中，就有意识地在组织上排斥了对"左"倾冒险主义苗头可能有怀疑的同志。即使在佳士抗争已经遭遇严重挫折、面临极大的失败和极严重的损失的时候，佳士抗争的领导集团仍然坚持其"左"倾冒险主义策略路线，把对策略路线的批评等同于对革命本身的批评，在将路线斗争道德化的同时，习惯于用组织手段解决不同意见的分歧。这就突破了王明"左"倾路线那样的宗派主义都没有突破的民主集中制的底线，彻底断绝了通

过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来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道路。正确的策略路线即便能够产生出来，也没有集中制前提之下的民主来保证它能够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于是，佳士抗争中的“遵义会议”没有能够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佳士抗争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遭到严重失败的同时，那些怀疑抗争中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并没有发展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来与错误路线相抗衡，也对失败负有责任。这固然与“左”倾冒险主义者将路线问题道德化，并以组织方式进行处理有关系，但这些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危害的同志自身也缺乏修养，没有组织起来，更没有去做工人的教育工作，没有通过争取觉悟工人的支持、自下而上地去战胜已经不可能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来战胜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够面对严重的失败和严重的质疑而仍不倒下，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内受到冒险主义影响的、工人出身的革命者支持冒险主义。激进工人的支持使得“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道义上的优势。实际上，这些激进工人之所以支持冒险主义，是因为他们在冒险主义的路线之外没有看到正确路线的实践，于是将冒险主义路线与革命本身划了等号。有觉悟工人支持的路线不一定是正确路线，但没有觉悟工人支持的路线一定不是正确路线。正确路线要证明自己的正确，除了求助于工人阶级先进阶层，除了通过这条路线指导下的实际工作，去争取比支持冒险主义的工人多得多的觉悟工人来支持自己之外，没有其它的办法。

通过支持冒险主义的觉悟工人来建立道德上的正当性，同样曾是王明博古

“左”倾冒险主义一时统治革命队伍的因素。1931 年 9 月，毛泽东已经领导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胜利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发展出了一条正确路线，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相对立。这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通过 1931 年 1 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央苏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取得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组织优势和道义优势，曾要求在“左”倾中央在取消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之外，再通过

“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传》第 27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即剥夺毛泽东对苏区政府工作的领导。如果这位支持“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人政治局委员来到中央苏区取毛泽东而代之，毛泽东和正确路线就会面对更大的困难：毛泽东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正式委员相比在组织关系上处于劣势；毛泽东也不是工人出身，与工人在道义比较中更处于表面上不可变更的劣势。但由于这时毛泽东的路线已经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本人在党内和国际共运中也已有很高的威望，“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历史经验也再次提示我们，有激进工人支持的路线也可能是冒险主义的路线，不能因为冒险主义路线有激进工人支持就放弃对之的批评和斗争。毛泽东这样分析激进工人支持冒险主义的原因：

“即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91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工人出身的同志因为自己的生活条件，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但这不等于工人出身的同志就天然具备科学世界观。工人同志同样需要无穷的实践磨练和理论学习，才能洗刷掉自己身上的旧世界的痕迹，哪怕这一洗刷的过程比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总体上要顺利一些。

最后，再回到我们对佳士抗争的总体评价上来。佳士抗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走向工人阶级的尝试都是正确的，不能用所谓的"道德绑架"去否定。但道德归因掩护下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集中制基础上缺乏民主，则是必须予以改正的错误。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的同志往往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通常比右倾机会主义者更容易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来，继续为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而不计较自己个人威信因此受到的损失。历史上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党、红军和革命陷入绝境的时候挽救了工人阶级的事业，离不开许多"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真诚反思。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等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通过遵义会议扭转中国革命的局面就不可能：

"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的主要成份，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些，乱子闹的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

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现在大家把这个帐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谈话（节录）》，《遵义会议文献》第 61、62 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今天，我们要在总结佳士抗争的基础上重新起步。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坚决地走向工人阶级。但不改正造成英勇的佳士抗争终于失败的冒险主义的策略路线错误，不通过政治报计划实质建党并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自佳士抗争失败起一起延续到今天的困难局面就无从改变。改变这一困难局面，需要在策略方向上反对佳士抗争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和犯过冒险主义错误但愿意改正的同志，一起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关于 2018 年佳士斗争的思考

读者来稿 • March 26, 2023

过去三年，无论是清零，还是共存，全中国无产阶级都深陷在这场灾难中。

现在，疫情过去了，但又似乎没有过去，无产阶级的处境仍在恶化:失业、工资下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一个个新的灾难不断出现。无产阶级承担了疫情的成本，也承担了清零的代价，在后疫情时代，依然要忍受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无产阶级却没有自己的政党去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我们知道，除了工人运动，没有其它途径通向社会主义；而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也不会发生能导向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甚至不能发生使得斗争成果得以保留的工人运动。此时此刻，不得不使人经常想起已经过去了四年多的佳士事件，斗争虽然早已失败，但围绕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的争论，依然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佳士斗争之所以仍然被关注、被讨论，原因在于现存的左翼组织参与群众运动的深度还没有超过它，特别是有组织的斗争方面。

《无产阶级斗争报》强调佳士斗争融工路线的正确性，不承认斗争当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不能提炼出佳士斗争的优点，也不能正视其存在的问题。显然，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单纯强调融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佳士斗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严重问题如果不得到认真总结，那么，2018 年那一轮声势浩大的斗争的代价就白付了。署名“清道夫"的《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搜集了大量材料，对于现实的工运路线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但出于托派小宗派的偏见，“清道夫”花了大量篇幅分析佳士斗争与保救派的合作，然后猜测佳士斗争的毛派组织者是否真的对当局抱有幻想；他没有看到，佳士斗争的组织者采取反复向上层呼吁的策略，虽然性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但实际上是力量不够导致的病急乱投医。“清道夫"的总结，实际上忽视了总结佳士斗争组织者的真正问题，即不正确的工运路线

导致的自身没有力量，从而陷入了对佳士组织自身是否存在与官方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保救思想的猜测。

这些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肯定和否定抓住了佳士斗争的一些方面，但没有上升到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总结，就是非常具体的，既肯定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也指出了巴黎公社领导者的诸多问题，指导了后来的革命运动。现在，当我们处于政治专制之下，很多工作不知道如何着手的时候，佳士斗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启发。这场运动所触及到的革命阵营的问题与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是异常丰富的，而且这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中国本土革命经验，是任何书本知识所无法替代的。

我们总的观点是：佳士斗争的突出优点是建党的历史主动性，与现实的群众自发运动主动结合，年轻人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以及网络游击战的宣传手段。主要缺点是（1）思想上马列理论修养不够，片面强调立场，忽视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没有找到巩固工人运动成果的正确途径；（2）组织建设上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都存在重大缺陷，表现为既没有民主（主要领导者的唯我独革，缺乏有效的内部纠正错误路线的机制），又缺乏集中（缺乏“中央”与“地方”的明确的上下级的关系）。因此，佳士斗争是在思想上组织上的错误路线下的“左”倾冒险主义行动。

在没有力量与敌人决战的时候，佳士斗争的组织者寄希望于保救派和毛派群众的声援，反复向上层呼吁，无疑是错误的策略选择，但这种向外界展现出来的政治倾向的不彻底和组织内部实际上的较为彻底，使得整个斗争阵线模糊，

进退失据。下面，我们将分成三部分对佳士斗争展开分析。

一、佳士斗争背后组织的情况

佳士斗争实际上是由一个左翼秘密革命组织领导的，这一点迄今还有很多人不清楚。佳士事件背后的秘密组织是中毛共第二代（2022 年 8 月 24 日,“声援佳士工友”电报群管理员突然公开宣称佳士工人运动不是一场自发的工人运动,而是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实际规模仍然是地方小组。政党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组织形式，显然,佳士事件背后的秘密组织的阶级代表性是远远不够的。从地域来说，他们基本局限于珠三角、北京和南京等少数的几个据点;从工人分布来说，组织佳士斗争的秘密组织并没有在重要产业和大工厂中建立工人支部和工人组织。

佳士斗争的领导成员是中毛共的幸存分子，他们吸取了 2009 年中毛共成立时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教训，试图按照马列理论，通过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来加强党的阶级基础。佳士斗争的领导者大约在 2010 年左右开始从事革命实践。他们的第一步，是在全国寻找和他们进厂融工思路一致的同志，最终他们与北大马会建立了密切联系。

大约在 2014 年，中毛共再次成立。在聚集了一批先进分子之后，尤其是与转型后的北大马会建立了紧密联系后，他们开始了全国性的布点与进厂融工尝试。到了 2016 年，北大马会形成了一套青年学生培养的速成方法，即只用大约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从国情国史到《共产党宣言》《怎么办？》等原著的理论学习，然后把学生变成行动小组的一员。

第二步，通过“工闹”模式发现和培养觉悟工人。“组织计划在南方搞工人运动。我们一般是以三个月为周期，先调研筛选一些合适的厂，然后安插人员进厂，伺机挑动工人，搞“工闹”。这次佳士事件也是我们一手策划的。16 年，我们先选定了两个公司进行工闹：佳士和 xxx……”（见佳士声援团官网《认罪视频文字整理》）。网上江森 16 硬汉的故事就是他们组织工闹的一个案例。

第三步，因为工闹模式留不下人，所以他们“后来没有这样做，先做工作发展人，在一个厂能够长时间待着。”（见佳士声援团官网《认罪视频文字整理》）实际上，他们转向了以组建工会为目标的斗争。佳士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016 年年底发生了南京中医药大学致远社事件，2017 年下半年又发生了“八青年”事件。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八青年”事件。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声援八青年的联名信在网上出现，到 2018 年 2 月 13 日左右广东警方寻求结案妥协，再到春节后取消网上追逃，“八青年”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这一结果极大地鼓舞了佳士斗争领导成员，但很遗憾他们没有正确总结“八青年”斗争胜利的经验，以为是当局害怕了，以为仅仅靠勇敢精神就可以取得胜利。事实上，“八青年”斗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是警方并没有掌握他们背后组织的详细情况，加上斗争策略较为得当，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左翼力量，并且成功地利用中央和地方官僚之间的矛盾，使得对方最后“不了了之”（见红色中国网《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在“八青年”斗争取得事实上的胜利后，中毛共认为 2018 年进入了所谓“政

治元年"。他们于当年 2 月份上线"时代先锋网"，开始大量报道维权事件，包括性骚扰、上海环卫工、塔吊司机、山东平度退伍老兵，等等。从这些报道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派了人到现场进行宣传鼓动，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左翼发展过程中是极为罕见的。

当然，关于政治元年的判断并非全然没有依据。2018 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危机状态，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出现了明显下降，以致当年出现多起大规模工人斗争，特别是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罢工，震动全国。然而，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是严重脱节的。在这种情况下，佳士斗争背后的组织试图参与到自发工运中去，想改变这种局面，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佳士斗争背后的组织的规模显然不能承担领导全国性斗争的重任。

二、佳士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佳士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 2018 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实体经济严重不景气，外资撤离，无产阶级失业半失业状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爆发的。在事件爆发前，深圳坪山已经发生了几起因工厂撤资引发的工人群体性事件。2018 年 3 月，后来的佳士斗争积极分子尚杨雪作为赛格晶端厂撤资事件中与资方谈判的工人代表，为工人争取到了深圳史无前例的"（1.5N+1）+10000"的赔偿。

佳士斗争是秘密组织工闹模式的延续，但后来领导者改变策略，想在一个厂里扎根，做长期打算（见佳士声援团官网《认罪视频文字整理》）。他们以成立工会为目标，试图模仿韩国 80 年代工人运动的模式，通过请愿、舆论声援

和少数人街头斗争的方式迫使当局允许成立民选工会，为工人运动的下一步发展拓展空间。在中国工人缺乏组织的情况下，这种建立民选工会的尝试不能说是不正确的。很遗憾，这个秘密组织打入工厂的工人因为过早暴露而被开除（余俊聪于 2017 年 1 月就进入佳士公司）。做过工人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什么时候斗争具备了条件，什么时候没有条件，这个分寸是很难掌握的。佳士“十八禁"等苛刻厂规的存在，使得这种斗争有了可能。这种可能性如何转化为现实性，需要各种条件，其中主要的是工厂内有群众基础，有秘密支部的领导，这样即使个别人暴露被开除，组织也有可能再生。显然，他们在佳士工厂不具备这个条件，当秘密组织成员被开除后，厂内基本没有响应。

他们争取复工的斗争失败后，赢得了舆论一定的同情，在沈梦雨组织现场声援团之后，斗争达到了高潮。但是，这种斗争并没有建立在有本厂工人群众参与的基础上。后来的情况说明，这场斗争几乎没有在厂工人的参与，余俊聪在厂外向厂内工友的呼吁，甚至到工头为安抚工人举行的饭局上散发传单，都没有得到工人的响应。因此，学生声援团的斗争是脱离工人运动本身的冒险行动，“11.9 大抓捕”证明其已被当局全部摸清，斗争宣告失败。

佳士斗争失败主要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导致的。

首先，组织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屡屡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有的极具投机性和欺骗性。比如错误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我方力量，经常说“全国人民都支持我们”；另一方面过分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主观地认为先进工人已经起来，敌人不堪一击，“胜利就在前头”。因此，7 月 27 日聚

集在佳士工厂门口要求复工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行动。还有 8 月中旬，在很多同志明确建议撤退的情况下，他们继续组织学生声援团做没有希望的斗争；8 月 24 日清场后，他们也没有趁敌人尚未摸清楚情况、骨干获释的机会保存力量，而是去韶山喊口号。再有就是 9 月份个别社团注册成功后，他们错误地认为是“敌人害怕了”，没有看到很多持同情立场的学校老师冒风险对他们的帮助，继续把学生社团搞成行动委员会，以致越来越孤立。到了 12 月，佳士事件背后的组织者仍然欺骗热心网友，说“这只是广东地方黑恶势力的定性，中央还没有定性，大家不要害怕”，“如果敌人继续抓人，将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等等。每一次行动失败，他们都想“押上更大的赌注”来翻盘，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佳士工人声援团成员主要是左翼社团的学生，在运动失败后，这些社团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少数大学开展的社团保卫战，也存在策略错误。学生社团是注册在学校的学生组织，是在有着官方党团和学工系统的环境中生存的，即便公开注册成功，也会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不可能像 2018 年以前那样开展工作。社团保卫战想通过向校方施加压力的方式保住社团，最多只能保住社团的壳子，而绝不能公开恢复之前的工作模式。实际工作的恢复必须另起炉灶，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更加灵活组织的读书会来进行。

其次，佳士斗争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例如，学生是先锋力量，却成了运动的主力，人数大大超过了本来应该成为主力军的工友。再如，参与斗争的工友都是失业状态或者其它工厂的，看不到佳士在岗工人。在没有在岗工人参与的情况下，斗争就完全脱离了工人运动的轨道，变成了没有群众基础的

先锋队孤军奋战。

最后，佳士斗争在“左”的同时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佳士斗争形式上激进，是街头政治斗争，内容上却有很多保守的东西，比如在无法得到在岗工人支持的情况下，反复向高层呼吁。从整理出来的两段认罪视频文字可以看到，很多人说的话与他们之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这是由他们自身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决定的。当然，这不奇怪，共运史上的“左”与右从来就是相通的。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佳士斗争的领导集团至少犯了以下错误：

第一，整个组织理论准备不足。佳士事件背后的秘密组织从核心到骨干再到外围，基本上没有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片面地强调学生进厂融工的重要性。然而，因为全体都进厂客观上也是做不到的，他们实际上还是按照工作需要分布在不同的战线上，也没有都进厂，但这种对成员的要求却排斥了一些人。另外，他们对马列主义工会理论和工人斗争的条件基本上不了解。列宁曾经说过，在专制制度下，争取行业性工会合法存开展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建立党支部领导的地下的秘密工会进行斗争。开始的时候，他们搞工闹是“左”倾的，在劳动法执行不规范的时候，团结了一批进步工友，但并没有把接受他们领导的觉悟工人尽量扎根在大厂里面组织支部，后来意识到工闹模式不可持续后想扎根下来做长期打算，但又采取一味争取合法工会以致不惜接受保救派的帮助和向官方反复呼吁请愿的右倾模式，“左”右摇摆。

第二，组织上没有真正建立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方面。组织的权威要靠集体领导和路线正确来保证，而佳士斗争的领导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说服大家参加斗争，而是使用组织权威压服大家。另外，佳士斗争背后的组织号称是政党，但并没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组织架构。

这个组织内部的“左”倾冒险路线曾经遭到一些人质疑，但他们内部并没有能扭转错误路线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左”倾领导者得到了组织内部激进工人的支持，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使得其他反对的人要么离开，要么只能接受。

第三，组织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他们对于其他左翼小组，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不听取批评意见，唯我独革。在此之前，“八青年”关注团成立后募集的捐款有一部分剩余，也被这个左翼秘密组织占用（见红色中国网《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第四，一些领导者的政治品质问题。这突出表现在 80 多页的供述上。这份供述据说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官方“把贺 XX 的长篇供述书发送给全国各地派出所、打印传阅给那几个月里其他被带到派出所的各地毛左青年阅读，以作为最佳的劝降材料”（见清道夫《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在认罪视频中贺 XX 说这场运动掺杂了他个人的私欲，想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实现他的政治目的（见佳士声援团官网《认罪视频文字整理》）。这种暴露出来的政治品质问题背后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思想根源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三、佳士斗争对其他左翼组织的影响及教训

佳士斗争实际是一个小组的斗争，但影响了其他组织，客观上构成了一次

政治斗争。佳士事件之后，左翼运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工人自媒体基本被摧毁，工人民间组织被打压。这给其他左翼组织提供了教训。

首先，路线不同的团体还是应该保持联系，而不应该因为策略性的分歧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因为，第一，无产阶级事业与资本家做生意和小生产都不一样，是一个阶级的整体事业，不同的小组、团体只要没有私心私利，最终是一定要走到一起的。因此，左翼内部的斗争应该转化为党内路线斗争。第二，敌人不会区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只会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所以“左”倾路线招致的打击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佳士事件后对全国范围内左翼学生社团的打击，是广泛而深入的，可以说直到现在很多地方的学生工作还没有恢复到 2018 年以前的状态。正如一个“大陆工人斗争参与者”在 2019 年 5 月的访谈中所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认识的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人、渠道和资源都被打掉了。那些直接做劳工集体权益的机构实体、人、场地、活动的空间、信息的渠道都没有了，人的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抓、有的自己害怕。甚至一些普通公益机构的活动都被限制了”（见“怀火”网站《对话大陆工人斗争参与者：佳士学生进厂的工作思路批评》）。

其次，否定佳士斗争的“左”倾冒险路线，并不代表否定这场斗争的一切。我们已经说过，佳士斗争的优点，在于他们建党的历史主动性，在于年轻同志的勇气、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这在当前国内左翼普遍缺少斗争经历甚至不敢斗争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佳士斗争的组织者以不成熟的斗争方式，居然持续了半年之久，在左翼群众面前刺破了当局虚伪的面具。此外，他们的斗争无

意间暴露了统治集团在协调体制内各部分力量镇压群众运动时存在极大的软肋，中央和地方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各怀鬼胎，都怕承担责任，思想认识也不统一。这为未来左翼斗争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这也是总结佳士事件的现实意义所在。

在这场斗争的众多优点当中，建党的历史主动性是当前整个国内左翼所迫切需要的。这种历史主动性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建党路径，值得总结。佳士斗争的幕后组织者建党的共同思想基础并不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认同以及纲领的基本一致，而是一个很具体却又不能作为建党基础的标准——愿不愿意融工以及在工厂开展斗争。这种标准实际上忽视了理论的重要性，也容易忽视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核心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既不能搞泛民主化，又不能一言堂。因此，片面强调融工和在厂斗争，会导致团队在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的建设出现严重问题。

佳士斗争还有一些具体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通过搭建动态网页和微博游击战进行舆论斗争，扩大社会影响，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反观近年来自由派的行动，都未有 2018 年该组织参与的米兔运动和佳士斗争影响大。时代先锋网能坚持 9 个月，在特色当局的高压统治下是很不容易的。值得一提还有杨郑君，他是声援团成员，在他和新生代网站其他两位编辑的不懈努力下，尘肺病人争取到了将近三个亿的补偿金。其中，每位尘肺病患者获得 12 万到 22 万不等的一次性赔偿和每月 3210 元的生活补助，以及终身免费

医疗。这是湖南的尘肺病工人九次艰难地到深圳维权才争取到的赔偿方案，但当新生代网站的三位编辑被捕后，这些补偿大大缩水了。

评价佳士斗争的复杂性在于没有一条正确路线与其并驾齐驱，所以，总结佳士的经验教训并不是站在一旁说风凉话，而是认真反思我们的现在和思考未来。我们现在的运动整体上甚至落在佳士斗争后面了。没有了时代先锋网，没有了 51 工号，左翼在 2021 年世硕昌硕斗争中几乎没有积极影响；在疫情期间，上海等地无产阶级陷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左翼分子也只是旁观。这种情况比起 2018 年佳士事件背后的秘密组织的活动范围来说，是大大缩小了。

那么，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呢？首先在于把各地小组转变成革命家组织，然后立足中国革命的特点，在重要产业和大工厂建立若干工人支部，组织工会和工人斗争，建立秘密的全国性政治报。

无产阶级生活日益艰难，失业问题极为严重，饿肚子、睡大街的情况正在发生，各种不满情绪正在酝酿，各种极端事件屡见不鲜，然而，革命组织的增长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发展。现在的突出问题是各地左翼组织在思想上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化的，但在组织上沉浸于小组习气，缺少把不同小组统一起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同一地区的小组也不来往。在具体工作方面，各地的左翼组织普遍存在严重的事务主义倾向，例如，从历史惯性出发做学生工作，但不明白从事学生工作的意义，对学生的教育也比较有限；再如，把学生工作、工人工作和宣传工作平列在一起而不是内在地联系起来，没有工作重点，各项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理论修养也无法得到较为明显的提高。此外，各

地的左翼组织还存在合法主义的倾向，似乎在当局允许的范围之外，就没有任何工作的空间。这是自缚手脚，革命活动本身就是违反统治阶级的反动律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合法主义是事务主义倾向的直接原因。

事务主义的哲学根源在于渐变论，仅仅重视量变，没有看到旧质限制了量的活动范围，如果没有质的飞跃，量的变化就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只有发生了质变，才能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的量的发展。小组习气这种组织上的旧质限制了工作的继承性，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小组的工作经验都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传承和共享。小组习气更大的弊端在于，它还限制了工人运动在更大范围的布点、经验分享、标准统一和人员的调配。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摆脱合法主义的思路，安全问题不能成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革命的整体需要。建党是革命运动的部分质变，舍此不能完成更多工作。现在各种左翼报刊分散化、重复化，各种工作经验都不能有效地提升，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以致于各种力量不能有效地整合，就连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各个小组都不能整合起来。统一一切革命力量，把所有细小的琐碎的力量统一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在重要产业和工厂建立工人支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政治斗争，都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列宁说：

“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

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见《从何着手？》，《列宁全集》第五卷，2013 年版，第 6 页）

当前，各地小组还在消极等待，还在落后的组织形式下开展工作，这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过渡到更高级的、更统一的、组织得更好和更完善的形式"（见《<火星报><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列宁全集》第四卷，2013 年版，第 285 页）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说 2022 年上半年上海封城还不能为我们带来革命形势，那么除了大规模战争，我们将不可能等来任何革命形势。或者说，在特色专制的条件下，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本身就是是革命形势出现的条件之一。小组应该变成革命家组织，这些革命家组织应该要研究局势，研究相应的斗争策略，从整体的角度安排各项具体工作，比如重大理论问题，工厂支部的建立，等等。

除了改变合法主义的策略，事务主义的改变要靠左翼分子自身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提高，勇于承担起历史责任。现在，把学生工作、工人工作和宣传工作平列的方式是极不妥当的，学生工作似乎只是一种过去工作的历史惯性，但培养的学生往哪里去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学生工作应该为革命工作输送人才，应该明确告诉他们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他们毕业后应该为什么而奋斗，应该怎么奋斗，应该如何在革命工作中改造自己。当然，这里面要谈的就是学生工作的意义了，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另辟专文进行论述。

列宁道路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September 29, 2021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让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先进思想，早在二十多年前的新旧世纪之交，就随着对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认识的普及，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开来。可惜的是，有革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找到革命的道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二次革命并没有太大的进展。2018 年的佳士抗争，这次二十多年里最英勇的尝试，也由于不了解路在何方，由于不能在那条尚在寻找在道路上自觉前进，由于不自觉地走向了政治冒险主义，而最终失败了。如果我们不能细致地发掘这次英勇失败中的经验和教训，那么我们就难以继续前进到更高的阶段。

深入地总结佳士抗争的经验教训，需要三方面的准备：一是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相关的研究，看一看佳士抗争在国际共运史所提供的理论框架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二是需要收集公开的关于佳士抗争的材料，主要是声援团的宣传鼓动文章，分析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路线主张；三是要寻找佳士抗争的相关人员的回忆录，比如说贺鹏超在被捕后的叛变自白，比如说声援团一线抗争人员的回忆文章。相比较于第一和第二方面的材料，第三方面的材料是不那么重要的，因为第三方面的材料，虽然能够满足一些猎奇的心理，但是对于总结佳士抗争的经验教训而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验证从前两方面的理论和历史材料中得出的结论。第三方面的材料，即使并不完备，也不会影响总结工作的进行。

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想谈的是第一方面的准备。国际共运史中，有几次比

较完备的革命经验的理论分析，即马克思对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回顾，列宁对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的准备和分析，毛泽东对 1949 年革命和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探索和总结。对于我们而言，列宁对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的准备和分析，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马克思道路主要是在西欧国家多少具备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爆发的革命的回顾。毛泽东道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共产国际帮助建党，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总结。列宁道路，则是在没有政治自由的专制帝国主义国家里，通过办全国政治报独立建党，培养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准备和分析。列宁道路的任务和条件，比起马克思道路和毛泽东道路，与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相似度要高得多。可惜的是，对这种相似度所要求的对列宁道路的了解，甚至这种相似度本身，很多同志都还相当地隔膜。因此，我们要专门谈一下列宁道路是什么，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在哪里。

列宁道路包含六个逻辑环节，列宁为此进行了六次重大的斗争。第一个逻辑环节是在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只确立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民粹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适用性，核心论据是俄国因为缺乏海外市场，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合法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但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没有能动性的宿命论。这两种学说构成了当时俄国左翼思想界的主流。乌有之乡近乎于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大杂烩，反对建立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革命而主张改良，甚至连主张合作社这样的具体想法都和当年民粹

派主张村舍类似。列宁道路的这个环节，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佳士抗争的参与者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早已超越了乌有之乡的改良主义。关于这个环节，推荐的文献是《我们拒绝什么遗产》（选集第一卷）。

主张革命，反对改良，就要找到革命的力量何在。列宁道路的第二个逻辑环节，是要向工人灌输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创造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阶层去自觉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的斗争。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历史悠久，加工全面，渠道众多，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形成社会主义的革命阶级意识，因此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以政治揭露为主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灌输。经济派从右面脱离了这个培养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任务，崇拜工人自发性，主张迎合工人阶级中落后阶层的单纯经济斗争要求，走向了工联主义。社会革命党从“左”面脱离了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任务，认为需要制造政治事件去刺激群众的情绪，而不是用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件去启发群众。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崇拜知识分子的自发性，和经济派崇拜群众自发性，都脱离了对工人阶级和其它社会成分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乌有之乡的思想代表之一老田，从右面批评所谓“纯左”（应读作“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走向了自我孤立，表现了乌有之乡类似经济派的对群众自发性的崇拜，取消了用坚定的原则性去培养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任务。而佳士抗争，则是从“左”面脱离了这个任务。某种意义上，佳士声援团的宣传鼓动起到了政治报的作用，但这种宣传毕竟是为营救被捕同志服务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为了自觉地培养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阶层，为了在将来必将到来的危机和革命的形势中推翻黑帮专制政府去努力。佳士抗争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

产党的影响下进行。无论是声援团，还是中毛共，都具有暴力革命、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内容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这是当年列宁所批判的以民粹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革命党所不能比拟的。这个环节推荐《怎么办？》（选集第一卷）。由于我们目前正处在这个环节，因此特别需要对之的研究。系统的掌握这个环节的内容，了解列宁在结束1900 年结束流放后，如何通过全俄政治报计划将俄国党及其群众基础创造出来，需要仔细精读《列宁全集》第四卷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到第八卷《进一步，退两步》的全部内容。如果每天能读 4 个小时的话，大概两个月可以读完这个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用了十余年时间都没有能够跨越的台阶在逻辑和历史上的总结。列宁在 1887 年被喀山大学开除之后，用了 7 年多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他能找到的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们花两个月的时间去做理论上的一点准备，应该不能算是过分。

向工人阶级灌输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需要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列宁道路的第三个逻辑环节，是建立一个地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秘密中央和秘密的地方组织，发行全国政治报，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的斗争。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主张集中制，坚持党员必须加入支部为党工作的党章第 1 条。马尔托夫主张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党员不必加入支部的孟什维克党章第 1 条。可是如果接受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第二个逻辑环节，即对无产阶级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去形成先进阶层，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思想影响必须通过组织形式巩固下来，只有组织上统一的党才能保证思想上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转变成群众的革命风暴去战

胜资本主义。布、孟两派的分裂是悲剧性的，这一或许可以避免的分裂可能让俄国革命的胜利从 1905 年推迟到了 1917 年。两派的领袖，即列宁和马尔托夫，在第二个逻辑环节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同一个省同一条河的上下游，共同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俄国变种的抗议书上签名，共同流亡海外一起创办《火星报》。如果他们在 1903 年的分裂之前能够有充分的组织见解上的沟通，或许悲剧性的分裂不会发生。那样的话，日俄战争所造成的 1905 年革命形势中，3 万多布尔什维克和 3 万多孟什维克就有可能联合起来，并领导数万社会革命党一起起义，而不是像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那样，分别起义后共享失败。这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学习和历史总结的意义所在：形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和军事上的一致见解，减少日后分裂的可能性。关于列宁道路的这个逻辑环节，推荐阅读《进一步，退两步》。（全集第八卷，只读选集第一卷中的节选是不够的。）

拥有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拥有了数十万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自觉支持，那就要在策略上敢于胜利。列宁道路的第四个环节，是主张建立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孟什维克策略观点的斗争。1905 年的革命风暴到来后，迫切的革命需要让孟什维克放弃了自己的组织观点，承认了列宁的党章第 1 条，但在策略上又认为地主在生产上是大生产，比小农先进，并担心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因而支持自由派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列宁指出大地主经济的农奴制残余多于机器生产，资产阶级一定会退出革命，应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通过工农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与专制的上层建

筑结合在一起，同样存在着改革这个上层建筑的民主要求。这样的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和列宁那时不一样了，但通过前三个环节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去争取必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则是一样的。这个环节最重要的文献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

列宁道路的第五个环节，有一些特殊性。如果以上四个环节和后面的第六个环节我们做得比较成功，我们可能不必经历这第五个环节，即在革命低潮时捍卫秘密党并开展合法斗争。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斗争。由于当时的俄国党在第三和第四个环节分裂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沙皇通过成立议会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方式渡过了 1905 年的革命冲击。但沙皇再也不可能像 1905 年以前那样统治了，不可能再像今天的特色黑帮那样主要依靠暴力统治了。这就产生出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保存秘密党，保存秘密中央和秘密党组织，保存秘密报纸，继续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为下一次革命准备力量；另一方面，要利用沙皇建立的议会开展合法工作，把沙皇进行欺骗的机构变成向沙皇进行进攻的阵地。孟什维克的主要部分变成了取消派，从右面攻击这条列宁在 1905 年革命以前就奠定基础的大路，要取消秘密党，变成合法的议会党。召回派不承认形势的变化，拒绝合法工作和合法宣传渠道，忽视了 1905 年后环境变化最重要的方面对工作的新要求。我们还没有自己的 1905 年革命，特色黑帮没有受到革命冲击，绝不可能让步。但我们也还没有秘密党。这个环节对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另一种环境中列宁道路的主要内容没有根本的变化。推荐阅读《政论家札记》（全集第 19 卷）去了解这个逻辑环节。

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方面分裂工人和其他群众的主要手段是民族主义，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保卫祖国。不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坚持国际主义，反对护国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形成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这构成了列宁道路的第六个逻辑环节。考茨基是非常有理论修养的护国主义者，其将马克思主义歪曲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企图最系统、最隐蔽。他将国际主义解释为各国工人阶级都有权利保卫祖国、互相反对，在战争后互相原谅即可。按照这种解释，各国无产阶级将与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疏远而与本国资产阶级接近，于是考茨基需要进一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把资产阶级国家解释成“一般民主”的产物，而不是按照唯物史观将之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论证了垄断、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唯一正确的口号。今天特色黑帮也突出地使用民族主义这个工具去腐蚀、分裂工人，如果我们不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和鼓动，就无法真正启发工人去理解那个让工人爱国，即爱专制政府的黑帮，是他们直接的压迫者。推荐阅读《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选集第 2 卷）。

这六个逻辑环节，构成了列宁道路层层递进的结构：只有在思想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唯一性，才有了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政治任务，才有在组织上将政治教育的成果巩固下来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思想统一基础上的强大组织，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力量，就谈不上争取领导权的策略。没有坚持这条秘密党去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信心，就难以在低潮时继续这条革命的直路。而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互相接近的、各国工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观念，国际主义会沦为空话。这种层层递进的结构产生了列宁道路的整体性：

如果否定其中某个环节，那么逻辑上就会否定其它环节，一路退回合法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改良主义。只有坚持这种整体性，坚持列宁道路，才能促使历史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走向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更好地总结佳士抗争，还应该注意这样几份材料。一份是列宁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在里面介绍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起义之前将之称为蠢举，但在运动起来之后却重视群众的主动性将教育群众去做下一次斗争。佳士抗争中的斗士们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主动性因素。第二份材料是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卷），以及毛泽东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如果说列宁道路是在反对右倾中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则是在反"左"倾中发展起来的，虽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主要是反右倾了。佳士抗争是"左"倾的政治冒险主义。为了深入剖析这次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王明教条主义的内容和毛泽东对之的批判，也是必不可少的。

亚马逊战斗中的工联主义和佳士抗争中的冒险主义

September 30, 2022

微信公众号"子夜呐喊"从 2022 年 8 月 29 日开始，不定期连载了题为《给

工会重新刷上'红色'的战斗底色丨亚马逊工人的斗争》的系列报道。在美国纽约市斯塔滕岛的亚马逊 JFK8 仓储中心，数千名仓储工人投票成立亚马逊历史上第一家工会的事迹，报道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大概是无意的巧合，报道开始发布的时间正好是在佳士抗争四周年之后不久。特别因为亚马逊战斗和佳士抗争提出的直接要求都是建立工会，且亚马逊战斗实现了这一要求而佳士抗争没有实现，引起了我们将二者进行比较的兴趣。

我们先简要了解一下两场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再从几个方面展开它们的比较。

一、两场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

与中国不同，美国具备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条件。虽然资本家一般都反对建立工会，政府归根到底也站在资本家这一边，但工人建立工会仍然是资本家及其政府能够接受的合法行为。亚马逊和沃尔玛一样，是以极端敌视工会而著称的——他们只在中国欢迎建立官方工会，因为中国的官方工会是黑帮和资本家的工会。2020 年 3 月，即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病毒毒性还非常强的时候，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亚马逊仓储中心，非洲裔工人斯莫尔斯(Smalls)和其他 60 多名工人组织了一场要求落实防疫措施的罢工。斯莫尔斯随即遭到开除，可是他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建立工会的宣传。这期间，他依靠互联网筹款来支持自己的生活和宣传工作，形成了一个 6 人的工人核心小组（“子夜呐喊”的报道称之为“斗争元老”），并得到了包括 1 名美共党员在内的至少 6 名知识分子的行动支持。按照美国的资产阶级法律，建立工会需要 30%的工人投

票赞成，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就在争取群众这条战线上展开：工人核心小组、知识分子和支持建会的工人向普通工人群众宣传建会，而资本家则进行反工会的宣传并阻碍建会宣传。在经历了 2021 年 10 月的一次失败后，斯莫尔斯和他的小组终于在 2022 年 4 月 1 日获得了总共 8000 多工人中超过 30%的选票支持，工会得以建立。工会建立后怎样活动，建会小组所特别关心的、如何进行集体谈判来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合同，我们所特别关心的、如何通过全面的揭露和多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通过报道目前都还不得而知。

佳士抗争发生在 2018 年。与美国不同，中国不具备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条件，黑帮专制政府实际上禁止建立其所不能控制的工会的尝试。深圳佳士公司中潜伏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 7 名工人先是在 2018 年 4 月发起了反对苛刻厂规的斗争，随后在 5 月提出了建立工会的要求。1000 多名工人中有 89 名签名支持了建会要求，约占 8%，而在亚马逊战斗中这一比例是 30%。区黑帮工会一开始许可了建会要求，后来发现难以控制，又收回了建会许可。和在亚马逊战斗中一样，资本家陆续开除了所有的核心小组成员。7 月 20 日，7 名已被开除的工人到厂门口要求复工和建立工会，被警察殴打并抓捕。厂内 1000 多名工人袖手旁观，没有同情和支持的行动。7 月 27 日，警察又对到佳士工厂声援的工人和学生进行了第二次抓捕。之后，几十名以学生为主、有明确社会主义理想的革命者陆续到达深圳，组织了声援团。但声援团在 8 月 24 日清晨同样遭到警察暴力清场和抓捕。后面还有针对各高校实质上是革命的社团的迫害，以及对泛左翼的打击，但一般认为 8·24 暴力清场是佳士抗争失败的直接标志。

美国警察也曾因亚马逊报警说斯莫尔斯非法侵入而逮捕过斯莫尔斯几个小时，然而并没有更多地暴力干涉建立工会的宣传活动。斯莫尔斯小组甚至合法地争取到了进入亚马逊员工休息室进行宣传的权利。两相比较之下，中国工人缺乏例如结社权这样的基本民主权利，对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形成了阻碍，是一目了然的。但这并不是我们比较的重点。无论是专制条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环境，只要马克思主义者原则坚定的同时能够适应具体历史特点，都能够启发和组织工人去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两场运动的主观方面，将是我们比较的重点。是否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否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是否有较广泛的工人基础，是否犯有策略路线的错误，将是我们展开比较的四个主要方面。

二、社会主义方向上佳士抗争原则性更强

在社会主义方向上，佳士抗争比亚马逊战斗有实质上更好的原则性。两场斗争都是争取工会的斗争，但争取工会的斗争不能跟工联主义直接划等号。列宁说：

“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怎么办？》第三章“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53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在工人尚不开展、经济斗争也缺乏自觉性的地方，经济斗争的鼓动既可以

成为社会主义的开端，也可以成为工联主义的起点。争取工会的斗争到底发展成社会主义还是机会主义，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取决于这个党是否将经济鼓动作为以政治鼓动为主的全面鼓动中的一个方面来加以推进，取决于这种全面鼓动中所培养的阶级觉悟是否与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和与继续革命联系起来。如果建立了全国性革命组织，出版包括定期政治报在内的种种宣传鼓动材料，并由各地支部和小组运用这些材料启发和组织工人，那么工会斗争会成为对群众进行原则坚定的政治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论是亚马逊战斗，还是佳士抗争，都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参与。据"子夜呐喊"公众号的报道，在亚马逊战斗中，知识分子梅迪纳(Medina)是公开的美共党员和马列主义者，且在美共网站上发表了分析亚马逊战斗的文章"我们在亚马逊如何胜利"。在佳士抗争中，组织核心之一郑时友在被捕后并不避讳自己的中毛共党员身份，且中毛共在 2022 年 8 月 24 日公开承认了佳士抗争是自己领导下的"政治斗争"。因此首先应该根据党纲评价这两个党是否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

美共 2019 年第三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通向美国社会主义之路：为和平、民主、就业和平等团结起来》是一个具有明显机会主义特征的文件。该文件这样写道：

"我们拒绝欢迎和寻求暴力行动的所有方法。"（纲领第七节"向劳动人民权力的革命过渡"，pdf 文件第 46 页）

在美共 2014 年第三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美共党章》这一文件中，第八

节第二款更是直接规定要把提倡暴力的党员开除出党。美共将选举作为获得政权的唯一途径，而不是将之作为教育群众的工具，反对暴力革命，这就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虽然纲领有反对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强调要教育群众具备社会主义意识等正确的方面，但是这些方面比起迷信选举、反对暴力革命等方面来，是次要的。原因在于：首先，排斥了暴力革命的主张，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改良主义可以接受的主张；其次，群众不可能从迷信选举的教育中获得正确的社会主义意识。与这种政治教育相联系的工会运动，不能不认为有强烈的工联主义倾向。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参与了亚马逊战斗的梅迪纳，在"我们在亚马逊如何胜利"一文中郑重推荐了美共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领袖威廉·福斯特的一本著作。福斯特曾经领导了反对美共中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对这一斗争的胜利表示了同志的祝贺：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17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福斯特领导下所恢复的美共，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福斯特本人是这个党的代表。希望重拾过去的精神财富能够给当代美共及其参与的工人运动带来一些改变。

美共成立于 1919 年。恩格斯曾在 1887 年写下了《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作

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序言。恩格斯在其中所提出的如下观点，或许更适合今天中国的工人运动：

“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318 页，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并没有这样明确的纲领文件，至少没有公布。但从公布的《告全国人民书》以及党章（节选）来看，即使没有提到暴力革命，但其立场渗透在了字里行间：

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旗帜，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方法地引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粉碎他们《08 宪章》的卖国阴谋，展开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执政党的伟大斗争，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和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

这比起美共反对暴力革命的纲领来，无疑在原则性上要明确得多。在佳士抗争中，声援团的官网发表了大量有明确改良主义言论的文章，没有能够完全坚持这种明确的原则，其基本原因我们在《佳士抗争中的所谓“道德绑架”问题及其掩盖的策略和组织错误》一文的第二节中已经做了分析。我们认为这样的动摇相比较于其社会主义方向来说是第二位的。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佳士抗争比亚马逊战斗具有更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虽然亚马逊战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成功建立了工会，而佳士抗争由于黑帮专制政府的暴力镇压没有能够实现建会要求，但是因为佳士抗争中的建会要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相联系，而亚马逊战斗中的建会要求与注定破灭的选举政治方向相联系，所以佳士抗争所代表的运动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三、佳士抗争的组织程度更高

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佳士抗争强调集中制，亚马逊战斗却缺乏集中制的组织，因此佳士抗争比亚马逊战斗在组织水平上也要更高一些。组织原则是政治原则的派生物，相应地民主集中制问题是社会主义方向问题的派生物。美共虽然在党章第二条第一款字面上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但因为它是一个意在选举的党，而不是一个准备暴力夺取政权的党，因此其组织上的集中实际上难以建立起来。在亚马逊建会过程中，也是在进行投票斗争，同样看不出来有集中制的组织在起作用。美共党员梅迪纳于“我们在亚马逊如何胜利”一文中，把自己接受在车间工作时间更长的工人的领导看作是正确的经验，没有谈自己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没有谈通过工会的工作把工人的意识提高到党的纲领中正确主张的水平上来，表现了在自发性工人运动与党的自觉领导之间关系上的模糊观念。相反，佳士抗争却是高度集中制的组织领导下的斗争，即使斗争条件远远恶劣于亚马逊战斗，但是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却能超过之，原因就在于组织水平更胜一筹。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组织原则。没有集中制这个组织武器，革命的思想力量就无法转变成革命的物质力量。哪怕这一组织原则可能造

成愚蠢的自杀式攻击，但自杀式攻击毕竟也是攻击，因此有可能发展成扬长避短、逐渐壮大的攻击。而排斥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就不可能组织起真正威胁到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群众性攻击。当然，须要从佳士抗争的冒险主义中严肃地吸取教训，真正地把自杀式攻击转变成群众性攻击，除集中制第一组织原则外，还须有民主这个第二组织原则，以及相应的例如代表会议这样的在组织内开展路线斗争的民主机构。

四、亚马逊战斗准备了更广泛的工人基础

在工人基础是否广泛这第三个方面，亚马逊战斗要胜过佳士抗争。《美共纲领》中多处正确地强调要对群众进行教育，启发其社会主义意识。例如：

“这样的意识不能从日常生活和自发斗争中独自发展出来。开展的意识须从教育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表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训练中，从和工人阶级共同斗争的实际经验中形成起来。我们为了增进社会主义者意识的成长和发展、为了今日世界和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工作。这就是美国共产党的任务。”（纲领第十节“共产党的职责”，pdf 文件第 56 页）

在亚马逊战斗中，建会小组为了争取工人建会意识的提高，做了长期细致的工作。从“子夜呐喊”公众号 2022 年 9 月 22 日的推送中，我们看到：

“按照美帝的相关法规，要正式组织工会投票必须获得 30%的工人签名同意，于是 Smalls 和 Palmer 两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在 JFK8 仓库内外开展宣传活动。Smalls 在工人们经常使用的候车站，向那些上下班后等车回家的工人进行宣讲……Smalls 等人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去做工作，才获得了两千多

工人的签名。”（《从说唱歌手到工人战士——Chris Smalls 小传｜亚马逊工人的斗争（4）》之三“两张桌子开始，内外结合组织工人”）

斯莫尔斯（Smalls)所做的这些提高工人意识的工作，也是我们须要去做的。不能因为这种工作孤立来看内容上的工联主义性质而反对这些工作本身。只要把这些工作所包含的内容转变成、扩大成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行。《美共纲领》说这样提高工人意识的工作是党的任务，虽然不完全，因为还有组织和领导从经济罢工直到武装起义的任务，但强调通过宣传教育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就一般原则上来讲是正确的。革命政党的各个支部，正是应该通过结合着工人的实际生活、实际斗争去宣传党的出版物的革命内容，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来支持更大规模和更高阶段的斗争。列宁曾写过一篇短文，揭示社会主义报纸《向理智呼吁报》发行量接近一百万份的意义：

一家社会主义报纸遭到美国法院的无耻攻击和迫害，却能在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日益发展和巩固，发行到一百万份，——这个数字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即将发生怎样的变革。(《美国工人的胜利》,《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118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能够延续下来的这个办报传统，我们应当加以借鉴。

与亚马逊战斗相比，佳士抗争则显得缺乏群众工作，不理解、也不重视工人自身阶级意识如何提高。佳士抗争中注意了解了工人的经济需要，也有声援团官网这样的政治报雏形，但这二者没有能够结合起来形成对工人的宣传和鼓动。实际上，只有开展像斯莫尔斯小组那样的群众工作，才能形成自己的群众

基础，才不至于在运动发起的时候缺乏工人的理解和支持。斯莫尔斯利用了他所处环境的合法条件；在中国虽然民主权利少得多，但同样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合法或半合法的形式去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在进行了这样的宣传鼓动工作后，在工人中形成了思想上接受革命思想的先进部分后，斗争中的号召才能获得实际的响应。像佳士抗争中那样，当针锋相对的斗争已经发动起来之后，才向参加资本家安抚饭局的工人散发传单，就会像斯莫尔斯要是临近投票再进行宣传一样，实在是太迟了。

五、两场斗争中分别犯的右倾和“左”倾策略错误及其原因

接下来，我们要比较一下两场斗争中的策略路线错误。亚马逊战斗中主要表现出来的策略路线错误是右倾的工联主义，佳士抗争中主要表现出来的策略路线错误是“左”倾的冒险主义。亚马逊战斗中注重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其觉悟，但其政治教育本身的性质是改良主义的、狭隘工联主义的。佳士抗争中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但缺乏对工人的教育，希望通过先锋队的独自冲击来激发群众的义愤并提高其觉悟，结果其冲击因没有群众的行动支持而失败，以冒险主义的方式葬送了自己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

“没有群众的政治就是冒险主义的政治”。(《论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295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佳士抗争中 8%的工人签名支持建会，与亚马逊战斗中超过 30%的工人签名和投票支持建会，直观地反映出两场斗争群众基础方面的差别。由于中国的专制条件，需要工人支持的比例、特别是工人支持的程度，须有更高的要求，从

而对教育和启发工人的觉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来说，佳士抗争中形成怎样的政治才是有群众的政治呢？就是亚马逊战斗中那样形式的政治——它的内容是错误的，但它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形式需要借鉴，并使之适应中国地下秘密工作条件以及合法半合法的公开工作条件。

关于党的社会主义教育任务，列宁这样写道：

“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以前一样，就是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29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为此，才需要去建立秘密的党，才需要去利用合法半合法的机会，才需要去进行经常性的政治鼓动并扩大群众运动。这样的政治就能够成为有群众的政治。

最后，值得分析的是，两场斗争中的策略路线错误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既与统治阶级的两种统治方法相联系，又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无形影响相联系。列宁曾经分析过欧洲工人运动中右倾的工联主义、修正主义与“左”倾的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交替出现的现象。

关于统治阶级的两种统治方法，列宁说：

“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这就是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

改良、让步等措施的办法。”（《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68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在列宁看来，暴力统治方法容易引起的工人运动“左”倾冒险主义的片面反应，例如德国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引起了所谓“青年派”反对利用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立法去教育群众的“左”倾错误。而“自由主义”的方法，则容易引起更加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让部分工人陶醉于资产阶级的“让步”而实际上抛弃阶级斗争的根本目标。佳士抗争正是在黑帮专制政府暴力统治下偏向了“左”倾冒险主义，亚马逊战斗则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偏向了右倾的工联主义。

关于两种策略路线错误所受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列宁说：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拒绝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规模巨大、坚强有力、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成为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织。”（《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67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亚马逊战斗的优点，在于避免了拒绝“细小工作”、拒绝合法机会的错误。佳士抗争的优点，在于承认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对立、承认工人的解放只有

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而它们各自的优点正是另一方的缺点。我们需要通过分析这两场斗争的经验教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在坚持佳士抗争正确方向的同时改正其策略错误，通过秘密组织的“细小工作”，通过利用合法机会和开展非法斗争的结合，把教育、组织和团结工人这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做起来。

拿着马列毛主义的武器走进现实——答羊肚对佳士抗争的分析

September 09, 2021

《列宁道路》频道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发布了《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引起了一些讨论，《星火导刊》杂志也予以转载。这篇文章肯定了佳士抗争是自觉的社会主义斗争，有集中制的组织，并进行了走向工人的尝试，分析了其策略上的冒险主义和组织上的集中制缺乏民主讨论去配合，结论是要坚持正确方向并改变策略错误，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施行全国政治报计划。

羊肚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发布了题为《伟大的正统的空谈者——评＜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的评论，批评上述文章“缺点就在于离‘马列毛’的教条太近，而离现实太远”。羊肚说曾经的北马即是这样的正统的空谈者，但

这样的马列毛教条一到现实里就不灵了，培养不了觉悟工人，加之北马误判2018 年的形势，导致了佳士抗争一定会发生。羊肚还认为民主集中制不可能实行，因为佳士抗争的一线参与者根本不知道上层的政治架构，而且当时的气氛也不允许对冒险主义路线的批评。羊肚的结论是文章作者是和北马一样的正统空谈者。至于羊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建议，并没有直接给出，从行文的逻辑来看，大概是要从现实出发，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甚至羊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本身，似乎也不那么明确。

被羊肚批评为“正统”，即坚持马列毛主义，是北马和作者的光荣。羊肚自认为有“常识”，我们提醒他“常识”被黑格尔称之为“偏见的集合”。在羊肚的评论中，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不是他对佳士抗争的分析，而是他提出的科学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也不准备与羊肚抽象地辩论科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因为这样做无非只能得到一些类似于科学理论与现实同样都很重要这样的一般性的结论。我们打算先谈一谈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再看看现实中发生的佳士抗争在这一科学体系中的哪个位置，这样读者就能自己从中看到为什么我们会得出被羊肚所批评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读者预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可能的挫折，以及如何应对。

列宁主义一般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反映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条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列宁主义产生的其它条件：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经济基础，毫无政治自由可言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泛滥的文化环境。列宁主义是在这些条件下于一

系列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与之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现实的适用性；合法马克思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否认群众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只有启发群众觉悟才能推翻专制制度；经济主义否认进行群众政治教育的迫切性，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必须对群众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才有进行暴力革命的阶级队伍；孟什维克否认组建集中制政党的必要性，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只有坚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党，才能对群众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并领导无产阶级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阶层；孟什维克在 1905 年革命中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革命才能成功；1905 年革命失败后，取消派要在专制制度下建立公开的党，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必须坚持走建立秘密党、发行秘密刊物去培养无产阶级思想觉悟的老路，并在 1912 年艰难地重建了布尔什维克党；1914 年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绝大多数国家的党从本国“实际”（应读作：资产阶级思潮）出发要保卫祖国，列宁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路线，支持而且只支持其它国家坚持这个路线的派别。

我们仍然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我们在其中斗争的国家没有政治自由，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当代中国的民粹派同样不同意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本主义，而是要和俄国的民粹派一样通过村社挽救逐步资本主义化的农村，只不过当代中国的民粹派不称之为村社，而是称之为合作社。当代中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样存在，不少所谓“左派”坚决反对建立新党走

向群众进行暴力革命（见范井冈的相关言论）。佳士抗争自然超出了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界限，是自觉的社会主义斗争，但其摇摆向社会革命党类型的政治冒险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相当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不在于羊肚所恐惧的不可能在工人中培养出觉悟部分，而在于克服自发性需要一个过程。列宁曾在《怎么办？》一书中讲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同样是自发倾向的表现，都没有发挥自己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自觉性；区别在于经济主义崇拜群众自发性，而恐怖主义则崇拜知识分子自发性。这里的恐怖主义正是讲的社会革命党所进行的政治冒险主义的暗杀行动。列宁认为，这种政治冒险主义没有把觉悟力量用于办全国政治报，形成代办员网络，并走向工人团体，从而在实质上建立有工人阶级觉悟阶层自觉支持的秘密政党。羊肚说在佳士工厂的手工业工作方式毫无进展之后，为了维护组织、路线和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就必然走向政治冒险主义。我们要对他大声说不，并且告诉他，在手工业方式进展不大的时候，应该走向全国政治报计划！羊肚批判政治冒险主义，然而我们在这里发现，他却仍然在用政治冒险主义的方式思考。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其它主义的“常识”，原因在于他缺乏马列毛主义正统的“常识”。作者把这样的偏见自诩为“细致的对佳士事件的历史研究”，把评论对象称之为“宣传材料”，也是由于他头脑中的这些“常识”在起作用。我们还非常希望羊肚把自己的正面见解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见解比起我们的全国政治报计划高明在何处，用羊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希望他在宣传的时候所说的话是没有保留地真诚的!”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潮氛围中，种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在运动

的各个阶段依次或强或弱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肯定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是因为它不仅完全把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甩在了身后，而且预示了未来斗争中一系列的正确原则。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 1895 年：列宁在那一年组织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沙皇剥夺了五年的自由，我们则经历了佳士抗争的失败。我们接下来会为这样的"伟大的正统的空谈"而努力：要有自己的《火星报》，要有自己的代表大会，可能在分裂后遭受 1905 年那样的高潮和失败，那时我们仍然要努力坚持这条老路。我们一定会遭遇帝国主义战争，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向政府一边去“保卫祖国”，我们依然要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老路，不给特色政府任何支持而致力于推翻它。今天我们不会再用俄文印刷机去印刷纸质报纸，而会用电子版的报纸去传播革命思想。代办员之间不会再用化学墨水写的邮寄信件去联络，而是用电报这类的保密网络通讯。农民土地要求不再存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需要怎样的经济动力，也需要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这是可以为现实改变的地方。而办秘密政治报纸、建立秘密党、形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领导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暴力推翻专制政府并建立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些正统原则，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因为“现实”和“常识”而改变。

怎么办 ——当下左翼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读者来稿 • May 08, 2023

一、《怎么办?》论自发性与灌输论

2020 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引爆了中国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经济危机，而黑帮专制政府的坐牢式“动态清零”政策更加剧了经济的衰退。这导致我国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化，并最终引发了去年 11 月的群众运动自发高潮，其中的郑州富士康工人暴动和广州海珠区的工人反封控抗议，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代表。而革命左翼对运动的领导则大大落后于自发运动本身，表现在 11 月事件并没有使革命左翼的声望和威信提高，却使自由派的“白纸革命”组织等非社会主义派别活跃了起来。

自觉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这正是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所要针对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为了厘清当今中国左翼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认真阅读列宁的《怎么办？》。**

列宁在《怎么办？》中区分了两种自发性，第一种是发生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工人骚乱，第二种是 90 年代的工联主义罢工。列宁指出，第二种罢工比起之前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从现有不多的资料来看，去年富士康工人和海珠区工人的抗争大体上介于这两种自发性群众运动之间。为了证明我们正确理解了列宁的原意，请允许我们在本文中大段引用列宁的原文：

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

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 70 年代和 60 年代（甚至在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 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 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 90 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28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列宁明确指出，**工人单凭自身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这个“外部”主要指的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觉悟知识分子。这也就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灌输论”。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 90 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29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其实，我们目前也能看到类似的趋势：在同情革命的年轻人中出现了学习马列毛主义的热潮，马列毛主义正在成为我国大多数革命青年的道路选择。在列宁看来，到了 90 年代中期，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其它地方类似组织的出现正是得益于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这两大因素的合力：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29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当我们把我国现阶段的左翼运动与《怎么办？》的要求做比较，我们就能

发现自己的差距和最迫切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认为，当前运动的最迫切的问题是：革命知识分子崇拜各种自发性，缺乏社会主义的理论修养和自觉性；自己都还陷于思想混乱和动摇，就不可能对工人阶级进行正确有效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其后果就是无力领导日益高涨的自发群众运动，即革命者的自觉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

二、当代左翼运动中的三种自发性

列宁在《怎么办？》中详细分析了经济派和恐怖派对自发性的崇拜。受此启发，我们也来尝试分析一下当前中国左翼运动中的几种崇拜自发性的错误。

1、极端崇拜自发性的“工益”小组

未明子派的理论和实践，就是放任破产的和感到破产危机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的一种典型的体现。未明子胡说什么“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只要不是“在明天就可以给工人提供午餐”的做法，就是在“生产左翼景观”；白领和失业工人应该抱团取暖，搞“互助兜底”，共同渡过经济危机。诚然，系统掌握革命理论和共运史的经验，不会在第二天就给失业的工人变出面包来，但这却是工人阶级从自发走向自觉，并最终彻底摆脱几十年来的奴隶地位的必经环节。

列宁在《怎么办？》中对经济派的严厉批判仿佛就是写给未明子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

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35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未明子就是要让破产小资和广大工人群众认为，得到明天中午的午餐，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政治的“左翼景观”都更加实惠和珍贵。未明子迎合了落后工人的心理，极端崇拜狭隘的眼前利益，极端崇拜自发性，并认为当前的一些左翼组织“不中用”，只是一种“景观”。他对当前左翼组织的涣散现状的评价是基本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应当是：我们要让左翼组织“中用”起来，我们需要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而未明子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工人不应该相信一切“从旁”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这样，未明子就成了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最坏的敌人-蛊惑家”。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

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中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116-117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列宁加的。）

但我们同时也要指出：未明子派这种在理论上破绽百出，在实践上温和得连改良派可以说都算不上的组织，竟然还可以吸引一批破产小资产阶级和一小部分工人参与进来，这是革命左翼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未派这样极端崇拜自发性的组织的兴起就是对革命左翼不作为的一种惩罚。

有同志可能会问：我知道未派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加入未派做工人工作可以吗？我们的回答是：在现阶段，自觉力量就如同阴暗潮湿的森林里散落的火星；我们应该尽可能汇聚起来才能起作用，而不是任由其散落自生自灭。要知道，一个火星在阴暗潮湿的森林里是很容易由于各种偶然因素而熄灭的。一个人去未派做工作，不会把未派变成革命组织，而只会把自己变成自发性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

2、冒险主义的自发性

列宁认为，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冒险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犯了

崇拜自发性的错误：

“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72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稍微有工人工作经验的同志都知道，工人在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时候，经常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该怎么办，想要马上行动，“要不要明天就把那个傻逼经理弄掉"。冒险主义的土壤就在于那些初步了解了马列主义但还不能将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这部分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间，例如佳士抗争的领导者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未明子派“崇拜”破产小资抱团取暖的自发性，冒险主义者则由于不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而“崇拜”少数人发起的冒险活动的自发性。例如在 telegram 上的“声援佳士工人”群聊中，就有网名为“火”的群成员这样发言：

我们工人必须要学习像佳士工人那样敢于勇敢主动出击、我们要组织团结更广大的工人去冲击现存的资本主义政府，让资本主义这个人剥削人、以及人压迫人的国家机器链条⛓更加快点的混乱崩溃才好。让更多工人在一次又一次冲击资本主义政府和资本家所有机构当中的行动中早点醒悟过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地球上做主人，而不要做奴隶。

然而，列宁在《从何着手》中就已经指出，在没有强有力的革命组织的情况下(因此也就不可能组成有力的“冲击队”；“强有力”的重要检验标准是能定期出版发行秘密政治报)，我们的任务绝不是号召发动冲击，而是建立革命组织：

我们的常备军只是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而且就是这几支队伍也还没有动员起来，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还不能组成作战队伍，更不用说组成冲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认清我们斗争的总的条件，而且在事变历史进程的每个“转变”中不忘记这些条件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当前的口号不能是“发动冲击”，而应当是“对敌人的堡垒组织正规的围攻”。换句话说，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列宁全集》第五卷，第 6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与工人相同，学生等知识分子中也会产生冒险主义。从俄国历史上看，民粹派在 19 世纪 70 年代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深入农民当中，号召农民起来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农民的普遍不觉悟，该运动除了在部分农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大多数农民没有起来革命。不久，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到民间去”运动以失败告终。“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部分民粹派建立了民意党，热衷于个人恐怖活动。在这里，农民不觉悟的自发状态成为了民粹派崇拜自发性，以恐怖手段“激荡革命情绪”的催化剂。

列宁指出：经济派和冒险主义者的共同问题是低估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并且都没有发挥自己的自觉性，回避了进行政治揭露、宣传和鼓动的责任。

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代替**鼓动，并公开承认：“一旦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恐怖手段的激发性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 68 页）这正好说明，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74-75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列宁加的。）

3、学生等知识分子中的自发性

与“左”倾冒险主义的自发性不同，学生等知识分子中还呈现出一种右倾的自发性，其典型是佐伊 23 这样崇拜所谓“脑力无产者”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是一种精英主义，只愿意在线上平台例如知乎和 b 站做泛左翼宣传，而不愿意耐心细致地做工人工作。

佐伊 23 在《资本的复兴和脑力无产者的左转》一文中认为：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

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他们有时候会以“安全问题”或者“工人也不觉悟”作为借口，拒绝做本地的工人工作。只要稍微有点革命常识的人都知道，革命工作不可能绝对安全，任何承诺革命工作绝对安全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叛徒。革命者应当在必然要做的工作中尽可能保持相对的安全。而对待“工人不觉悟”这一问题，则应当是加紧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而不是放弃工人工作，甚至蜕变为未明子这样的沙文主义者。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这样写道：

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帝国政府的官吏，他们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聊以自慰，他们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辩护，来替自己向刑棍和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列宁全集》第二卷，第 439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佳士抗争中各高校的左翼社团曾经用了极大的毅力来同这种学生中的自发性作斗争，为此不惜将工人的先进性抬高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地步，却由此陷入了“左”倾的自发性——冒险主义之中，这也是佳士抗争中冒险主义路线的来源之一。

自发性的显著特点，就是滚到对于自身所处位置“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自发性相互攻击，都认为自己是自觉性的代表，而真正的自觉性则面临被这三种自发性压倒的危险。正是由于已有的学生等知识

分子的工作没有培养出“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也就事实上放弃了对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责任和使命，因而导致工人中沙文主义、个人主义、改良主义泛滥成灾。也正是由于革命左翼忽视了在当下经济危机中对于破产小资和工人的工作，导致破产小资被未明子派所俘获，而一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则由于难以忍受残酷的现状但又没有掌握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产生了冒险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的倾向。

4、黑帮政府在助长自发性方面的作用

对于已经非常自觉的资产阶级和黑帮专制政府来说，无产阶级永远处在自发性也就是永远处于被他们奴役和剥削的境地，自然是他们力求永远保持的最舒服的状态。因此他们会用尽手段来摧残破坏无产阶级和革命左翼中的自觉因素。由于黑帮的监控、搜捕等镇压手段，目前的马列毛主义革命者只有零散一些小组，分布在全国各地，处于碎片化和山头林立的状态。这在客观上为各种自发状态的大量泛滥提供了基础。

正如列宁在回顾经济主义产生的历史时所说：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像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不要说亲身参加过当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

这样。(《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35-36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我们很不幸地看到，从佳士抗争到今天的不到五年里，一大批立场坚定的左翼同志被捕了，很多人被放出来之后仍然受到了严密的监视，缺乏自由工作的机会。对仍在外面可以自由工作且具有自觉革命认识的左翼同志来说，应该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注意安全工作，竭力避免自己被捕（当然这绝不是以减少革命工作为代价），要知道，每一点自觉力量的损失，都会使得更多群众陷入更大的自发性和盲目当中，给目前自发性的泛滥提供更大的空间。

三、中国左翼的发展历史

中国左翼的发展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到 2012 年。这一时期是老左派和乌有之乡“保党救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高潮是 2009 年的通钢事件和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二者让很多老左派看到了希望。同时，这一时期的珠三角地区工人运动则处在温和改良的自由派劳工 ngo 的领导之下。在这一时期，拥护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者还寥寥无几。

第二个时期是 2012 年到 2018 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有许多左翼青年和左翼社团涌现出来。这些社团大多数都坚持了马列毛主义，批判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少数比较坚定的左翼社团战胜了学生中的自发性，自觉地选择走向工人阶级，却又不加思考地接受了冒险主义，最终导致了佳士抗争的失败。

第三个时期是 2018 年佳士抗争失败以后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正如列宁所说：

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172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这种假嗓出自于三种自发性：未明子之流的抱团取暖、佳士抗争后遗留的冒险主义、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精英主义的倾向。2021 年，一批马列毛主义者采取了冒险主义策略，在国内开代表大会；尚未对工人群众进行更多的宣传鼓动，就被警方一网打尽，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但是与此同时，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阶级斗争本身还在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的只是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觉性在广泛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

正如列宁所说：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转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渡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结束第三个时期。**

（《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173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四、列宁如何结束第三个时期

列宁在《怎么办？》中，为结束第三个时期开了两个药方：第一个是培养职业革命家，第二个是全俄政治报计划。这对同样处于专制制度之下没有政治自由的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结束第三时期病症的第一个药方，即需要培养的职业革命家，列宁将之定义为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118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第二个药方就是著名的《火星报》计划。列宁在《从何着手》中这样写道：

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做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就迫使我们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列宁全集》第五卷，第 8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列宁的这两个药方对于当下的中国左翼来说也完全适用。两个药方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创办全俄政治报，就必须有职业革命家；因为全俄政治报所需要全国的代办员网络，恰恰是职业革命家搭建起来的。这点我们在《巴布石金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

列宁已经告诉我们，运动的总的利益是**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灌输。**从这个总的利益出发，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关于“融工”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策略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厘清“融工”这个概念，是融入“工业区”、“工厂”还是“工人”。这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扎根工业区，

通过多种形式做工人工作。第二种策略是进入工厂打工，做本厂工人的工作，领导工人对抗资本家的斗争，并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和组织。第三种策略则不一定要扎根在工业区，但是也要求通过小组学习和宣传鼓动的方式培养工人先进分子。如果我们稍微细心地考察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三种策略在不同时期都存在过。这三种策略的目标都是对工人进行全面的政治灌输，领导工人运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也就是说，这三种策略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所争论的是哪种策略的效率最高的问题。如果想论证己方策略的效率最高，应该拿出当代的实际材料（当然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而不是空对空的争论。

对电报上的左翼来说，单纯线上的空对空的讨论容易把一些不必要的琐碎问题的争论扩大化，陷入无原则的义气之争中。这其实是不利于左翼同志团结的，即使争论一百年也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我们认为，只要是坚持马列毛主义革命原则，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左翼同志，都应该尽可能的团结起来，从事线下实际的组织工作，努力把自己锻炼成职业革命家；然后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首先是到工人阶级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从觉悟工人小组开始，从而为全国政治报的创建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提供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 2022 年应该上街还是办报？

August 06, 2022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代替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请你们回忆一下 1901-1902 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传说的时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杂志），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写于 1905 年革命期间（《列宁全集》第 11 卷，第 53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上街即游行、示威、集会等，是革命斗争的重要形式，如列宁所说，‘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把提议上街一律打成‘左’倾冒险主义，实质上是取消政治斗争，而不经过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教育和锻炼出‘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所谓‘言即是行’，只应当从鼓动的意义上理解，即大量散发斥责政府、抨击政府的传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而这需要火星报和代办员网络。如果贵频道认为在远离工人群众的境外软件上发表几篇机会主义言论就能称得上是革命行动，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满足于这种‘阶级斗争’、不应该采取更有力的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将永远无法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你们的理论实际上没有给工人运动留下什么位置。就算是自发的经济维权

都常常引起工人上街游行、打横幅、跟警察发生冲突；否定上街只证明你们极端落后、极端脱离现实和群众……本群禁止键政，提倡投身实际斗争。只是上述问题涉及原则立场，所以不得不表态。”——工号 51 读者群管理员批评《列宁道路》，写于 2022 年 8 月

工号 51 管理员批评《列宁道路》的起因，是因为《列宁道路》一篇评论佩洛西访台的文章《帝国主义战争在迫近——简评佩洛西访台》中主张台湾人民有民族自决权，指出只有这样才能反对特色黑帮的民族主义宣传，才能推动两岸工人阶级互相接近。工号 51 的一位读者反对台湾的民族自决，认为这是“台湾在美帝洗脑下的分离主义思潮”，并提出了“上街”的问题。《列宁道路》指出上街是“左”倾冒险主义，是比在台湾问题上的沙文主义更严重错误，然后看到了上引的工号 51 管理员的批评。台湾问题上的自决权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者唯一正确的立场，但我们不准备在本文中再展开这一立场。这里着重谈谈更重要的问题，即大陆的工人阶级如何觉悟和组织起来的问题。在 2022 年，负有这一历史责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精力是应该投入到参与和组织诸如游行、示威、集会这样的上街行动，“投身实际斗争”呢，还是应该去办报纸？

工人阶级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走向自己的十月，有一条列宁已经成功过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条件不佳：在日益壮大、但并未觉悟的工人阶级身旁，除了几百个觉悟知识分子、几十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剩下的就只是“左”边的政治冒险主义和右边的经济主义的各自侵蚀了。没有稳定的全国政治报，没有各倾向革命的小组之间的联系，没有各倾向革命的小组与

当地工人的联系，谈不上实质存在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各地支部和工厂委员会，也谈不上超越手工业方式的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工作。至于工人武装和地方政权，就更谈不上了。这条道路的第一个阶段，突出任务是创办和发行全国政治报。这项工作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统一思想，把各个小组的意识提高到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水平上来，为党的建立制定纲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经济主义的影响；二是建立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建立代办员网络，把党的骨架搭建起来；三是推动各个小组建立与工人的联系，即把成功的小组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小组去，把个别小组的工人工作经验变成各个小组的共同经验。没有办报的阶段，各个小组的重大的、原则性的思想分歧将在共同理想的掩盖下长期存在，各个小组的分散状态将在形式统一的党的掩盖下长期存在。党即使建立起来，也事实上四分五裂、没有战斗力、不能领导全国性的工人斗争。

这条道路的第二个阶段，是通过代表大会把各个小组形式上统一起来，去创造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必须用形式上、组织上的统一巩固起来，用正式的党内联系代替非正式的、往往以个人友谊为纽带的小组联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调配原来属于各个小组的人、财、物，以推进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把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水平从自发形式的低级阶段提高到政党形式的、自觉的高级阶段上来。在这个阶段上，以全国政治报为基础的革命政党已经形成并稳定下来，运动的持续性有了可靠的保证，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初步形成，反过来使得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力量变得强大、不易被镇压。这个时候即使仍然没有政治自由，组织游行、

示威、集会也可以成为比较常见的斗争形式和教育群众的办法。

这条道路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中去发动武装起义，推翻黑帮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了。这个阶段，如果再停留在“上街”，停留在组织游行、示威和集会上，而回避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就变成了右倾的尾巴主义。我们现在处于第一个阶段，尚未达到第二阶段，因此详谈第三个阶段并无必要。其中可能出现的曲折等更丰富的内容也不必多说。我们就限于指出与“上街”相关的这一点吧。

总结起来，在今天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上去攻击政治报“极端落后、极端脱离群众”，主张“上街”，是“左”倾冒险主义。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不理解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政治报建立革命政党的任务，不自觉地保持工人运动的自发水平和低级形式，使得斗争的第一阶段无法完成，更谈不上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在斗争的第二阶段上，则不能说“上街”是“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三阶段上，只谈“上街”的主张则已经随着斗争的发展从“左”倾冒险主义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它回避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我们不在一般意义上肯定上街，也不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上街，但在当前阶段，即进行革命初步准备的第一阶段，不能赞成上街的口号。一般意义上否定上街，恰如工号 51 管理员所警惕的那样，犯了取消政治斗争的经济主义错误。但这并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只是主张目前不应号召上街。一般意义上肯定上街，例如在第一阶段就把觉悟分子和工人一起上街作为策略的基础，正是犯了先锋队独自决战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列宁在 1895 年组织了上街，同时筹办了政治报《工人事业报》。结果是已经秘密监视了他七年之久的沙皇政府随即抓捕了他和他的几乎所有同志，把他们送去了西伯利亚。《工人事业报》也夭折了。由于革命力量被关押和流放，各小组中的经济主义借机开始泛滥，工人运动的自发状态也继续保持了几年。列宁于 1900 年重获人身自由。他没有再次组织上街，而且坦率地承认自己原来缺乏修养。列宁甚至反对直接召开代表大会在形式上重新建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898 年形式上而非实质上成立了），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筹办和发行全国政治报《火星报》上。直到 1903 年，拥护《火星报》的火星派才终于召开了代表大会，把党事实上建立了起来，为创造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为俄国革命在 1917 年的辉煌胜利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

我们在全文开头所引用的列宁的话，是列宁写于在第三阶段回顾第一阶段的时候。在这样走向革命高潮、走向武装起义的时候，列宁仍然对第一阶段的庸俗革命主义深恶痛绝。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列宁的观点和工号 51 管理员的看法。

言即是行的道理，被工号 51 的管理员解释成“只应当从鼓动的意义上理解”。列宁仿佛在直接反驳他：“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其次，工号 51 管理员说：“大量散发斥责政府、抨击政府的传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贵频道认为在远离工人群众的境外软件上发表几篇机会主义言论就能称得上是革命行动”。列宁却说：“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分发‘血的传

单'，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都是在工人阶级成长为改天换地的那种历史力量的第一阶段，办政治报而非组织上街的主张，在列宁于境外办报的时代被攻击为“清谈”，在我们的时代被攻击为“境外软件上发表几篇机会主义言论”。历史何其相似。我们多么希望，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也能够和列宁经历的历史进程相似。但要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没有思想理论的交锋和统一，就没有政治和组织的统一，就不可能渡过这个历史过程的第一阶段。因此再次，“禁止键政”是不对的，这只会把运动限制在自发状态，阻止思想理论统一并走向政治组织统一的进程。正如列宁所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怎么办？》，《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3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工号 51 管理员引用了“上街”活动构成党的活动基础这句话。这使我们在分歧之外，看到了大家思想理论上统一起来的可能性，毕竟大家都认可列宁、引用列宁。这句话正是列宁在结束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创办《火星报》之前的 1899 年写的。我们对这句话有不同于工号 51 管理员的理解，认为列宁这句话实际上支持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把列宁这句话及其前后文附在这里作为结尾，请读者们自行判断列宁一目了然的意图到底是赞成主要力量上街还是赞成主要力量办报：

“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

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

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如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的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乡村的和市镇的）、公开领导手工业者联合会（工会、行业工会）等等，等等。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而且正是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

（《我们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69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文章写于 1899 年，列宁时年 29 岁，因领导彼得堡斗争协会组织数万纺织工人罢工一案被困在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小村里。几个月后列宁结束流放生涯回到欧俄，沿途与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约定了通讯密码后流亡海外，开始办《火星报》。）

为什么冒险主义者读不懂列宁

August 08, 2022

《列宁道路》8 月 6 日发布了《在 2022 年应该上街还是办报？》一文，指出在今天，觉悟分子主要精力不应上街，而应该主要投入办报活动，尝试着通过思想、政治和组织的统一，推动各小组与工人接近并且互相接近。《马列毛主义之声》坚持上街的冒险主义主张，发布了《"列宁道路"是怎样篡改和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篇文章堆砌了太多没有真正消化的列宁著作的引文，却完全没有理解列宁。值得注意的是，冒险主义者还把佳士工人运动作为"群众性的政治示威游行"来为自己的冒险主义辩护，这就让我们知晓了其冒险主义观点的来源和为什么他们读不懂列宁的原因。我们先分析几个冒险主义者没有读懂列宁的例子，再谈一谈佳士抗争正确的方向和它的冒险主义错误。那些对冒险主义策略的失败实践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最后几段。

第一个冒险主义者没有读懂的例子，是他们面对列宁庸俗革命主义的指责，硬说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列宁在 1905 年回顾 1901-1902 年时说：

"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纳杰日丁）。"（《列宁全集》第 11 卷，第 53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冒险主义者试图切割"游行示威"和"公开的群众发动"，说游行示威不算"公开的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才是，以此来证明今天只有组织武装起义是

庸俗革命主义，而组织游行示威不是。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列宁在 1902 年是怎样批判这位纳杰日丁的，看看列宁有没有反对他游行示威的主张。纳杰日丁这个经济派分子被列宁认为是一个有些思维能力的论战对手，因此列宁在《怎么办？》第五章“全俄政治报‘计划’”中大段引用了他的错误观点作为应予批判的典型。

经济派纳杰日丁也要准备游行示威，他说：“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这种更具体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是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立刻准备工人的力量去游行示威，由地方组织在失业工人中经常进行工作（经常在他们中间散发传单，召集他们开会，号召他们反抗政府，等等）。”（转引自《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53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立刻准备工人的力量去游行示威”，看起来真像《马列毛主义之声》写的。可惜列宁对纳杰日丁的话一个字也不赞成。针对“立刻准备工人的力量去游行示威”这一条，列宁是这样讲的：

“决不能把‘准备游行示威’同《火星报》的计划对立起来，因为这个计划正是把最广泛的示威当作目标之一”——如果只看到这里，冒险主义者会认为列宁在支持他们。列宁接着说：“而问题却在于选择实践手段。在这里，纳杰日丁又弄糊涂了，他看不到只有已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示威游行（游行示威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完全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现在正是不善于去集合和组织。”（《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58–159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马列毛主义之声》就像经济派纳杰日丁一样糊涂，搞不清楚为什么只有，注意是只有已经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示威游行，也闭口不提今天中国的游行示威也绝大多数是完全自发的。列宁这里说的军队不是指拿着枪的工人阶级武装，而是指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整个《怎么办？》，以及列宁那个时期的主要目标和实践，都是用全俄政治报去推动各地组织工作的发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每举行一次游行示威都让所有力量紧张到极点并使所有人面对被捕的风险。《马列毛主义之声》的每一段引文都谈到了游行示威，却看不到每一段引文都贯穿了集中力量办好政治报和代办员网络，去为传递政治书刊、组织工人讨论小组、领导游行示威等准备组织力量并保证其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精神。

冒险主义者把《火星报》上涉及示威游行的引文找了一大堆，试图证明列宁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冒险主义者。我们把冒险主义者所引用的《火星报》出版的小册子和刊登的文章各举一例，看看他们是多么不理解列宁。他们引用的第一篇是“《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在整段引用列宁描述这座乌克兰城市五一游行示威情况后，冒险主义者进行了一次冒险，他们接着引道：

“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准备五一游行示威，事前散发了小册子和传单；工人们还拟定了总游行示威和在马场演说的计划。……”

省略号之后接上的内容，居然是在 3 页之后了。真是省略号使用的大师。我们感到有些奇怪：难道冒险主义者是在赌我们不会去核对引文吗？这倒是很符合冒险主义的特点：赌一把，或许能成功。那他们到底想隐瞒什么呢？被省

略（隐瞒）的是：

“可是为什么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呢？哈尔科夫的同志们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觉悟的工人社会党人‘总部’的力量分配不平衡，这个工厂多，那个工厂少；其次，因为工人们的计划‘被当局知道了’，当局自然就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离间工人。结论很清楚：我们缺少一个组织。”（《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27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这就是所谓“我们已经列举足够多的材料”之一。为什么只引看似对自己有利的材料，不引对自己不利的材料，特别是不引用结论呢？冒险主义者们要从片面引用的材料中得出结论：列宁号召上街。列宁自己的结论是：我们缺少一个组织，要通过全国政治报把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

然后，冒险主义者又引用了《火星报》的时评《183 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引用而又不理解的话再引一次：

“如何组织这一抗议活动，要由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小组来决定。**散发和张贴传单，举行各种集会，尽可能邀请社会各阶级的人士参加，——这些都是最切实可行的抗议形式。但是，更理想的是，在那些有巩固的和坚强的组织的地方，能够通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来组织更广泛更公开的抗议活动。去年 12 月 1 日在哈尔科夫《南方边疆区报》编辑部门前的游行示威，可以作**

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家攻击一切追求光明和自由的意向、颂扬我国政府一切暴行的卑鄙报纸，当时正在开庆祝创刊日大会。编辑部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兴高采烈地撕碎了《南方边疆区报》，把报纸系在马尾巴上，用报纸包着小狗，把石块和盛硫化氢的小瓶抛进窗口，并且高呼："打倒卖身求荣的报纸！"这就是卖身求荣的报纸编辑部和所有国家机关真正应该得到的庆贺。**长官赞赏的庆祝大会并不经常召开，但是显示人民制裁力量的庆祝大会倒是应该经常给他们开一开的。政府专横暴虐的任何表现，都是举行这种游行示威的正当理由。现在政府公开宣布惩办大学生，人民也就应该给它来一个公开的回答！**"（《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50-351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黑体是冒险主义者加的，就先放过他们一次吧）

这里面关键的一句是："但是，更理想的是，在那些有巩固的坚强的组织的地方，能够通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来组织更广泛更公开的抗议活动。"列宁始终是把通过全国政治报建立稳定和可持续的组织作为上街的前提，视为当时尚未达到的一种理想状况，而冒险主义者始终看不到这一点，一看到"游行示威"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列宁的意思换个说法就是：如果情况不理想，在那些没有巩固坚强的组织的地方，就不能够通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来组织更广泛更公开的抗议活动。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的看法，需要提到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对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事的总结。列宁总结此事的教训时说：

"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

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二三月事件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了。”（《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6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大学生被送去当兵引起了多地的示威游行，而不出意外地沙皇黑帮残酷镇压了这些游行示威，参与游行示威的群众有数百死伤。这就是“二三月事件”。没有一个地方的游行示威发展成为哪怕是零散的武装斗争，因此列宁这里所讲的“不能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不可能是指武装斗争，而只能是指游行示威。列宁说“大概不会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还是低估了冒险主义者的顽固程度，因为他们在 120 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

不需要再去一一分析冒险主义者的那些《火星报》引文“证据”了。他们所不理解的《火星报》出版的目的，正是为了结束各地工作分散自发的手工业状态，把它提高到集中自觉的工业化状态。为了把党建立起来，就需要有政治报，有党纲，有互相之间的联系，有和工人的联系。这既是迫切任务，也是着手之处。觉悟分子的主要力量只有集中于此，才能把这些尚未跨越的阶梯在现实中搭建好。《马列毛主义之声》洋洋自得于“办报就要号召上街”，又要办报又要上街。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列宁批评布哈林用折中主义代替了辩证法：

“‘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

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列宁全集》第 40 卷，第 290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办报和上街总体来看是不对立的，因为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报纸办好了之后，思想政治和组织的统一就能够实现，上街会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没有全国政治报和代办员网络的阶段，办报和上街这两者有直接冲突，表现在既有人力物力财力通过政治报建党就已经需要极大的努力，而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组织和参与游行示威则会削弱这一努力，阻碍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马列毛主义之声》为了自己的折中主义，又在引用上进行了一次冒险：

“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69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这里面的黑体是冒险主义者加的，又赌我们不会去核对引文。首次发言时的冒险：只引党的活动的基础是游行示威，不讲办报。这一次的冒险：被逼得把办报部分也引进来，但修改列宁的黑体，把列宁说没有全党机关报游行示威

会失去绝大部分意义的黑体抹去，自己给游行示威部分加上黑体。其实读者只要花几分钟，搜索列宁《我们的当前任务》并通读一下这篇仅仅五页的文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列宁主张的当前任务是用全党机关报来将分散自发的活动统一成阶级斗争，而绝不是组织和参与游行示威。如果读者愿意多看一些，就会看到列宁那时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在围绕着这个当前任务展开。

这些冗长讨论的现实意义，在于从佳士抗争中继承什么：是继承它正确的方向，还是继承它的冒险主义错误。不分析佳士抗争的经验教训，我们就没有重新出发的历史起点。《马列毛主义之声》将佳士抗争称为“佳士工人运动”，定性为“群众性的政治示威游行”。今天我们在网上已经看到足够多的材料，知道它确实是政治示威游行，但主要不是工人运动，群众性也很微弱。佳士抗争之所以会成为冒险主义者的典范，正因为佳士抗争本身就进行了政治冒险主义的尝试。佳士抗争想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有集中制的组织，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尝试。造成抗争失败的不是这些正确的方向，也不是斗争不够英勇，而正是《马列毛主义者之声》主张的又办报又上街的冒险主义策略。佳士抗争的同志办的“时代先锋网”、“声援团官网”可以认为是政治报纸，是全国政治报的雏形。正确的策略是以这些政治报纸为起点，把全国的各个小组联系起来，推动大家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统一，并在各地做工人的教育和组织工作。教育工作的日常活动，是组织工人小组讨论政治报上的以政治揭露为主的各种文章和他们生活的联系，组织与自身状况相适应的斗争（通常不是上街），而这些工作本身要求良好的秘密机构、充分的训练和严格的分工。通过政治报在全国意义上把中央机关、地方组织、秘密机构、训练和分工良好的小组创造出来，

正是比今天任何小组力量都要强上百倍的佳士抗争团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使用现实材料，不妨还是引用《火星报》上的一封工人来信吧：

“……我们把《火星报》第 7 号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都弄破了，而这号报纸却是很宝贵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当你读到报纸时，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带领我们前进的那些知识分子了。这些人确实不仅威胁着老板的钱袋，而且威胁着沙皇和厂主……工人群众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说得真对！……过去，每次罢工都算是一次大事件，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光罢工算不得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必须争取自由，用胸膛去争取自由。现在所有的人，不论老少都愿意看书，只是可惜我们没有书。在前一个星期日，我们召集了 11 个人在一起阅读了《从何着手？》一文，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说得多么正确，多么透彻……我们很想向你们《火星报》写一封信，希望它不仅能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着手，并且还教我们大家应该怎样活和怎样死。”（转引自《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458-459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只有通过此信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言即是行的工作，才能把知识分子小组的工人基础创造出来，并使得小组中的工人成分逐渐占优势。这样，运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就建立起来了。在我们工作的目前这个阶段，有群众自发的游行示威，这显现出群众有政治斗争的能力，更显现出组织工作跟不上自发斗争。

当务之急是要让组织工作跟上自发斗争，把自发斗争改造成自觉斗争。唆使地方上势单力孤、缺乏工人基础的小组去上街，只会把家底都输个精光，然后循环往复，保持运动的自发状态。列宁分析冒险主义和经济主义是相通的，道理就在这里。《马列毛主义之声》言必批经济主义，却不知道自己是经济主义的好朋友。这种策略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也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佳士抗争在这样的阶段号召示威游行，赌上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去实践了《马列毛主义之声》“又办报又上街”的冒险主义策略，结果没有多少工人响应，变成了先锋队与特色黑帮优势力量的决战，最终遭遇多轮抓捕，损失的力量直到四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恢复过来。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我们今天只能重头再来，但绝不会再重复佳士抗争的冒险主义错误，要不然佳士抗争那么大的损失所换来的经验教训就白费了。

冒险主义事实上是对工人阶级极大的犯罪，因为这一错误策略让那些本来可以凭借正确策略发展起来的斗争去改善自己状况的工人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如果四年前执行的是正确的策略，而非冒险主义的策略，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或许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孕育，并开始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比如那些因热射病死去的工人，可能就会因为这些斗争所争得的改善而活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冒险主义也需要为这些工人的失去生命负些责任。《马列毛主义之声》至今不理解佳士抗争的经验教训，仍然坚持冒险主义观点，这是他们引用列宁却不懂列宁的现实原因。如果《马列毛主义之声》坚持自己的冒险主义观点，并且行其所梦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重蹈佳士抗争失败的覆辙，再次对工人阶级犯罪。

最初的两步——回复《简评“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

August 19, 2022

发布《为什么冒险主义者读不懂列宁》之后，我们收到了署名“工号 52”的评论《简评“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文章认为各方在力图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需要借鉴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经验，有必要办政治报和建立代办员网络这些方面有基本共识。文章同时提出了一些疑问，最后指出还有更严重的分歧，即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还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有分歧。尽管依然存在着误解与分歧，尽管在分歧的问题上我们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但至少说明《列宁道路》关于通过政治报和代办员网络去建立革命政党来教育和组织工人的主张得到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真诚思考。我们原则上同意该文的如下号召：

“创办全国性政治报，建立代办员网络，向工人群众开展长期的宣传和鼓动，才能为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做好准备，才能使自发的维权斗争发展为改天换地的革命洪流，才能使中国的革命事业向前推进一步。有志于革命的同志都应当为这个目标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这篇评论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不仅是因为它总结了争论，在指出分歧的同时提出了原则上正确的号召，而且是因为它试图给出“更加详细的行动路线”，开始在思想上探索那最初的两步：各小组如何与工人接近并互相接近？今天我们也谈谈在这两个最初步骤上应该如何重新出发。

一、最初的与工人接近的步骤

与工人接近这个步骤上，我们反对与工人尚无密切联系的小组自己上街或者号召工人上街，而是主张这些小组通过文化工作开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应当通过文化工作与工人接近，而不是一直如此；文化斗争应当成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武装斗争的基础。一旦文化工作有了成效，则应当尝试建立更广泛的秘密组织，推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工号 52”进行了这样的设想：

“代办员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应当将文章以电子版、纸质传单等各种方式交给工人群众，应当组织他们讨论这些文章和各种社会问题，还应当让工人群众掌握在 tg 等安全性好的通讯软件上交流的能力，应当不断吸纳先进工人加入代办员队伍。”

“工号 52”担心“这些设想难免有空想的性质”。不是的，这些设想非但没有空想的性质，而且正是开始走向工人的各小组所应当做的工作。正如列宁在幻想全俄政治报的时候说的：

“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怎么办？》第五节“全俄政治报‘计划’”，《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62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我们在这里向读者推荐两本书：《巴布石金的回忆》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频道已发布）。推荐的理由是这两本书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两个方面介绍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最初步骤。

我们先来看看工人方面。巴布石金一开始是一个没有觉悟的农民工，14 岁开始打工，18 岁来到首都彼得堡谋生，在那里进入了列宁开展工作的工人小组，以及后来成为列宁革命伴侣的克鲁普斯卡娅进行活动的夜校，迅速地觉悟起来成为了一名忠诚的战士。他没有能够活到革命胜利，在 1906 年为武装斗争运送武器的过程中被捕牺牲了。他的这部仅仅不到 200 页的回忆，是在 1902 年按照列宁的建议，暂时放下了《火星报》代办员的工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的。回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忆他在彼得堡是如何在列宁的帮助下成长和斗争的，第二部分写他被捕并被关押、放逐后，如何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今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独立开展工作，建立这个城市具有工人基础的委员会。这两个部分都值得我们花些时间去研究，因为这两项任务，即培养工人革命家和建立自己所在城市的统一的委员会，都是我们现在应当着手解决的迫切任务。

在第一部分中，巴布石金描述了列宁给工人小组讲解政治经济学的情况。这个小组是列宁推动知识分子们建立的多个工人学习小组中的一个，组员只有六个人，但列宁在这个小组讲了一年多的课，直到自己被捕才被迫中断。巴布石金并不知道他的老师会成长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正因为如此他的回忆才具有特别客观的价值：

“讲解员向我们口述了这门科学，没有用笔记本。他常常设法启发我们站起来反驳或者争辩。那时候，他总是鼓励我们，要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辨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学习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而且

还会慢慢地把自己养成为演说家。这种学习方法是向学员说明问题的最好的手段……这些学习还教导我们去自修，去找寻参考资料。我们从讲解员的手里拿到了上面写着许多问题的纸头。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留神了解和观察工厂里的生活情况。于是，我们在厂里干活的时候，时常假借各种借口到别的车间去，实则上是通过观察的途径去收集必要的信息。”（《巴布石金的回忆》第 45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巴布石金在加入列宁的读书小组之前，一方面通过文字资料，另一方面通过与人的交往，已经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跟随列宁这一年多的学习和工作，让他变成了一个有一定修养的革命者。无论是来自沙皇政府的迫害，还是与孟什维克的斗争，甚至是面对黑帮军队的枪口，都没有让他有过丝毫的动摇。或许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工人觉悟起来、坚定起来的经历，或许是他长时间做工人工作的体会，让他特别强调工人学习小组相对于传单等宣传鼓动工作的基础作用：

“显然，这是因为各个学习小组在继续努力进行各自的活动，并且恰如其分地符合极其正确的工作方法，也只有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被公认为令人十分满意的。凡是在宣传鼓动的时候放弃学习小组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转上不正确的、有害的道路。”（巴布石金的回忆》第 68-69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下面会谈到，列宁赞成马尔托夫关于从小组内宣传转向群众性鼓动的主张，但反对放弃学习小组。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工人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著作，对于铲除工人头脑中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使其产生稳定的世界观并坚决地参与革命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人的这种世界观一旦形成，哪怕读书学习不如知识分子系统全面，由于其阶级立场的作用，也会比知识分子主要建立在书本上的世界观稳固得多，并且会反过来鼓舞知识分子更彻底地投入到事业中去。今天各个小组都应当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到组织工人学习小组中去，这一工作会和“工号 52”所正确“幻想”的其它宣传鼓动工作一起，为各个小组走向与工人的密切联系开辟道路。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也非常重要。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的建党策略比中毛共的高明在哪里？》曾经分析过这次大会不成功的原因及其对今天中国革命的启示），巴布石金参与建立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成为了派出代表的四个委员会之一。另外三个委员会所在城市分别是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都是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大得多的城市。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列宁塑造了巴布石金这根“自己不会熄灭而且能够点燃其它木柴”的“木柴”，如果不是巴布石金推动了自己被放逐的城市的工作，参与建党的区区四个组织甚至会再减少一个。需要提到的是，巴布石金似乎并没有事先知道党的一大的召开，而是通过知识分子带回的一大宣言才知道的。这应该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集团和觉悟工人集团虽然有工作上的配合，但还没有完全融合起来。知识分子集团派出了参加一大的代表，并没有事先告知觉悟工人集团。这种情况反映了手工业工作方式的缺点，因为并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去协调构成一地委员会的各个小组的融合和发展。这种情况在全俄政治报创办以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03 年二大召开时就已经有二十个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了。

我们现在没有全国政治报，也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在努力创造这些条件的同时，各地的小组不应等待，仍然需要尽力用手工业方式去与工人接近并互相接近，因此巴布石金的一些做法仍然值得借鉴。在他的回忆里，我们看到那时的委员会虽然进行了初步的工作，虽然工潮的产生仍然基本上是自发的，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趋势已经产生出来了。巴布石金在这个阶段上特别强调传单的作用：

如果只在某个地方常常出现传单，就能使这些传单及时地发生效果，能使它们更详尽地谈论所发生的现象，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果能使工人信任传单，那么在罢工或发生工潮时，他们就愿意同意传单上所谈的一切，这也就是把运动引向预定目标的杠杆。”（《巴布石金的回忆》第 136-137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这本回忆到 1900 年为止。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这位工人革命家是如何作为《火星报》代办员工作的细节了，更看不到他如何一步步地从宣传组织工作走向 1905 年革命中的武装起义工作。这个遗憾可以通过《巴布石金的回忆》一书中的附录得到一些弥补。附录是作为《火星报》代办员和通讯员的巴布石金发表在《火星报》上的文章。我们建议读者也花一点时间去读一下这位觉悟工人所写的宣传鼓动文章。这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启发。这些通讯介绍了自己身边的工人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困苦和折磨，揭露了资本家的虚伪和贪婪，歌颂了工人团结一致与官家和资本家所进行的斗争，还把工贼公之于众。我们在进行工人工作时，即使暂时还没有全国政治报，也应该写类似的通讯给小组

内外的工人阅读。我们特别注意到巴布石金对需要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阅读材料送给工人的呼吁。比如：

“我们这里争先恐后地阅读‘火星报’，不论来多少份，全都被人们阅读着。‘火星报’使工人们都感到运动的强力高涨。大家都纷纷议论第 3 期‘火星报’上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大家都想弄到这份报纸。在个别会议上，工人们希望‘火星报’就这个问题再刊登几篇文章。”（《巴布石金的回忆》第 162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又比如：

“而宗教道德内容的书籍，青年们是不屑读的。他们确切地意识到这些书籍的愚人和害人的意图……在没有办成秘密图书馆以前，还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求知欲望。”（巴布石金的回忆》第 166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如果说《巴布石金的回忆》是从工人方面、从“下面”介绍了社会主义如何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列宁回忆录》，即列宁爱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方面、从“上面”介绍了列宁的工作。这方面集中在全书第一部的第一目“在彼得堡（1893-1898）”，篇幅只有 17 页，却浓缩了很丰富的内容。里面提到了列宁在工人学习小组中工作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工人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前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讲解，后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详细了解工人的工作和劳动条件，并向工人们说明他们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告诉他们怎样、用什么方法可以改造现存制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人小组中讲课

的特点。”（《列宁回忆录》第 9 页，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知识分子方面的回忆与前面的工人回忆正好形成了映照。克鲁普斯卡娅和巴布石金的回忆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还原出列宁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第一步。这样的文化工作，开始把工人的头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克鲁普斯卡娅转述了列宁对这一时期的正面评价。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列宁对这一时期负面的评价。克鲁普斯卡娅这样写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时期在彼得堡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并不显著、不为人注意的工作。他自己就这样评论过这一时期的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的工作并没有效果。当时的问题并不在于建立英雄的功勋，而在于怎样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怎样接近群众，学会表达群众的良好的愿望，使群众了解而且感到亲切，学会领导群众。正是在彼得堡工作的这一时期，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锻炼成了一个工人群众的领袖。”（《列宁回忆录》第 9 页，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二、与工人接近之后的下一步是转向群众性鼓动吗？

在谈完了各小组接近工人的这一步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工号 52”实质上已经提出的各小组依据纲领互相接近的那一步。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接触另一个话题，即组织工人学习小组之后，从学习小组内的宣传转向对组内外工人进行鼓动的这个“下一步”。1893-1895 年这个时期，列宁积极推动了这个转向。列宁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除了上述工人学习小组外，可以分成这样四个方面：第一是与民粹派的思想斗争，第二是推动各知识分子小组和工人小组的省内统

一和跨省联系，第三是我们要谈的从小组内的宣传转向对组内外工人的鼓动，第四是办报。第一个方面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即各小组与工人接近和互相接近关系比较间接。我们的读者中受到乌有系，也就是今天的民粹派影响的人很少，我们就不展开对民粹派的思想斗争这个方面了。后面这三个方面就需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知识分子小组和工人小组的省内统一和跨省联系，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占据工作中重要的位置，因为不管是办报，还是对工人的鼓动，甚至鼓动工人上街，都需要组织的发展。但列宁当时不是通过全国政治报和正式纲领的办法来扩大组织的范围，而主要是通过开会。列宁于 1893 年 9 月抵达彼得堡，10 月加入工艺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并通过这个小组开始接触工厂工人。（《列宁年谱》第一卷，三联书店 1984 年版，下文简称《年谱》，第 100、102 页）1894 年春天，列宁主持了工人小组组织者的会议，推动建立工人小组并开始在一些小组里讲课。（《年谱》第 109、115 页）1894 年秋天，列宁领导了由这些工人小组组织者、领导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小组，进行了省内组织统一的尝试。（《年谱》第 116 页）在 1894 年的冬天，关键的转变出现了：

“列宁召集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小组会议，同各工人小组的代表讨论把组内宣传方法转变为群众性政治鼓动工作的问题；宣读了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印行的小册子《论鼓动》中的一些段落。会议作出决定：在不放弃组内宣传的同时，立即根据工人们的迫切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在他们中间进行广泛的口头或书面鼓动工作。”（《年谱》第 118 页）

宣传更多是理论性的分析，鼓动更多是通俗性的解释。宣传主要依靠小组内学习讨论，鼓动主要依靠面向群众的口头讲述、传单和小册子。列宁在这里宣读的小册子《论鼓动》由后来千夫所指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审定，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而转向在工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列宁当时没有接受放弃学习小组的意见，但很赞成在学习小组这个第一步之后和在这个第一步的基础上，转向群众性鼓动。甚至到了 1902 年出版的《怎么办？》中，列宁还提到了这本小册子中“真正有益的启示”（《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30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即扩大工作的范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群众性鼓动成为了上述三点工作的重心。直到 1895 年 10 月，彼得堡的 20 多个小组在组织上统一起来了，列宁被选入领导核心负责编辑一切出版物，才开始筹划彼得报组织的秘密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年谱》第 131、135 页）

总之，在 1894 年冬天到 1895 年冬天这一年的时间里，列宁同时进行着五方面的工作：一是理论上反对民粹派，二是统一彼得堡的组织并建立跨省组织之间的联系，三是继续工人小组的宣传，四是全力在学习小组的宣传阶段后转入群众性鼓动阶段，五是准备出版区域性的报纸。第四方面的工作，即群众性鼓动成为所有这些工作的重心。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克鲁普斯卡娅转述的列宁对这一时期建立与工人联系这个方面的肯定。他还肯定了这个时期的工作提出了广泛的历史任务，提出了工人阶级要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可是列宁对这一时期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总体上是否定的。

列宁对这段工作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怎么办？》一书里。这本小册子只有

183 页，是布尔什维克的“圣经”。今天中国的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仔细地去思考里面的每一句话，甚至对论战性的内容也是如此。它不仅是对经济派和冒险主义者的批判，也是对列宁自己失败经历的剖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针对列宁彼得堡斗争协会时期工作的教训写成的。列宁这样反思自己的彼得堡斗争协会时期：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30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列宁同时进行着五方面的工作，完全料到了自己会被捕。他甚至指导别人一旦被捕应该如何应付法庭的审判。（《年谱》第 138 页）他不存在“怕”的问题，但他仍称自己当时是“手工业者”，用这个他去批判经济派的严厉字眼来批判他自己为之失去了五年自由的工作。原因不在于向工人进行群众性鼓动工作的转向错了，而在于没有把为之准备相应组织力量的政治报计划和建党计划提到直接的群众性鼓动工作的前面。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在进行了工人小组工作后，像他自己过去曾经实践过的那样，随即转向全力进行群众性鼓动是错误的。正确的办法是把重心放在以全国政治报计划为支撑的组织工作上来。列宁这样描绘自己的小组和其它类似小组失败的过程：

“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96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为了避免这样失败过程的循环往复，为了避免自己 1893-1895 年的手工业错误再次重演，为了批判试图把这种状况固定下来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的经济派，列宁写了《怎么办？》。《怎么办？》这本书就是在讲要建立一个思想上（第一、二章）、政治上（第三章）、组织上（第四、五章）巩固的党，去对工人进行有延续性和继承性的政治教育和鼓动。逻辑上来说，对工人进行政治鼓动、进行原则坚定的政治教育是运动的总的利益，为此就需要思想政治组织上巩固的党，而为了这样的党的出现，就需要有全国政治报。实践中，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这样：先去办全国政治报和代办员网络，然后建党，再以党的组织为武器去用工业化的方式对工人进行政治鼓动。每个阶段的其它工作的开展，都应以不伤害主要任务的实现为界限。

回过头来看，“工号 52”的简评文章就多少带有调和的性质。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办报’和’上街’”中，“工号 52”针对列宁道路“办报和上街这两者有直接冲突，表现在既有人力物力财力通过政治报建党就已经需要极大的努力，而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组织和参与游行示威则会削弱这一努力”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革命的阶段性并不能将办报和上街对立起来，理由是实际斗争能够鼓舞群众的斗志。其在论证时作了一定让步：是否号召“上街”要看具体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地方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群众的结合很紧密，那就有必要号召，否则就不必要，比如佳士抗争。作者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目前没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小组与群众结合很紧密的地方。而且没有全国政治报和代办员网，这样的地方就不可能出现。创办全国性政治报并在代办员网络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让这样的地方能够出现。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工号 52”说的地方左翼小组应该是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种组织。为什么不能以这种组织作为基础去发动群众，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工号 52”还认为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能避免组织被破坏。如果真是这样，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成员就不会几乎全部被捕了，列宁也不会批评自己曾经是手工业者了。

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对“最初的两步”中的一步，即各小组如何与工人接近的讨论了。与工人接近的工作，各小组应该从办工人参加的、政治性的学习小组入手，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群众性的鼓动并领导群众性斗争，但以不妨碍小组背后的地下组织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为界限。这样的鼓动和斗争都是可能的，并且在近年来曾经成功过。只是可惜我们只能在原则上讲到这个程度，不能在

这里举实际的例子了。

三、另外的关键一步

“最初的两步”中的另外一步，是各小组的互相接近，为全国政治报和革命政党做准备。这一步，“工号 52”的文章实际上也提到了，即第 3 部分所谈的民主革命问题。作者正确地指出：

“如果需要革命队伍向着共同的目标奋斗，思想上的统一是前提条件……”

各个小组在思想上的接近，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接近的前提。为了实现各小组间的这些接近，就需要广泛深入地，首先是严肃地探讨统一的纲领所涉及到的各方面的问题，力求在争论中让科学的观点脱颖而出。这就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制定纲领的问题，和在例如民主革命这样的纲领问题上出现分歧后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先来谈制定纲领的问题。《列宁道路》曾经发布了文章《列宁如何制定纲领》，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强调了列宁对那种认为发展地方组织和进行具体工作比制定纲领更迫切的观点的批评。各个小组都应该关心纲领问题，都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来看待并参与到其中。参与的方式是对纲领所应列入的问题展开研究和调查，并写文章发表意见，最好是直接提出自己小组仔细斟酌过的纲领草案。那么哪些问题应该列入纲领呢？目前最可借鉴的文献，是列宁在 1895 年于狱中写就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草案分为五个部分，即阶级斗争的状况、党的任务、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工人阶级的纲领和农民的纲领。（《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69-93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二大上正式通过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 7 卷附录），与这个草案相比，在结构上弱化了第二部分即党的任务部分。俄国党通过二大已经建成，因此这个部分可以弱化，但党的任务部分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草案需要突出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实质上建党的任务。还有两份文件可以参考：一是俄共（布）八大通过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 30 卷附录），在第一部分于一般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之外还谈了帝国主义，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草案的第一部分也要讲“中特”从复辟资本主义到走向帝国主义的过程；二是中共二大的宣言，区分了民主革命纲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在纲领所涉及到的众多问题中，不可能不出现各个小组间的分歧。甚至各个小组在纲领的诸多条文中总有一些不一致，才是正常现象。那么这样的分歧如何处理呢？能不能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拒绝和争论对手团结起来呢？我们来看看列宁如何建议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看到德国革命者在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等机关上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派要抵制这一类机关，另一派主张利用合法机会。列宁认为抵制这一类机关的“左”倾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坚定的英勇的革命者缺少革命经验”（《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214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对这些“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正确态度是一方面公开与之斗争，另一方面不要夸大分歧，要与之联合为统一的党，让实际斗争去消除这种意见分歧。列宁也这样建议过英国的共产主义者联合为统一的党。列宁这样建议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在统一的党中，思想上胜利的一方才能利用组织的物质力量来强迫思想上失败的一方来执行自己的路线。如果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胜利就没有实际意义，就变

成了对资产阶级而言无关痛痒的争吵。如果思想上失败的一方拒绝履行党内义务，那就不得不与之分裂了。因此，今天在联合的时候，所有主张革命、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小组都应该尝试融合成为统一的党，然后用党内程序去解决意见分歧，包括纲领上条文的分歧，并执行多数的意志。列宁的这种主张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一定在思想理论上会取得胜利，而且要用组织的形式统一去物质化这种胜利的信心。但是列宁的主张并不总能被接受：机会主义者畏惧自己会被统一的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所吞噬。一般来说，右倾机会主义者会拒绝执行党的纪律，例如孟什维克就是如此，从而导致其被开除出党；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会因为在自己的眼中，正确路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路线，拒绝联合。例如，英德两国就有这样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接受列宁的建议，顽固地坚持不与他们眼中参与资产阶级议会的“修正主义者”联合，最终变成了脱离群众和统一的工人政党的小宗派。

至于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由于《列宁道路》已经曾经有过不少文章，在此不打算详细阐述。“工号 52”的批评中，有许多的误解和错误。在未来进一步的纲领讨论中，《列宁道路》会结合对已经存在的纲领中的理论错误，例如中毛共宣言中的错误的分析，去展开自己的观点。我们在此只是预先声明：我们准备按照列宁的建议，与主张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些小组联合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之内，并利用思想理论上的武器去争取自己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党内的胜利。如果一时改变不了目前各小组中主张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流行观点，我们会在服从党的纪律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历史的进程会让多数党员认识到我们理论立场

的正确。

《列宁道路》关于各小组相互接近的路线图就是如此，即利用纲领来互相接近，公开讨论纲领中的分歧，但不让非目标性的分歧妨碍各小组融合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最初的两步：各小组如何与工人接近并且互相接近。在这两步中，全国政治报都会发挥脚手架的作用。

四、“力所能及”、“空想”与“键政”

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了引发争论的“工号 51 读者群”成员“刘皓”的最新发言。他说：

“上街游行示威是重要的斗争手段，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无条件，无理由，无目的的上街，革命和斗争是要看时间和机遇的……我看了很多左派的群，我发现辩经似乎更像是一种自我满足，批判是合理的，但是批判的同时现实中不如大家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不然真的，荷尔蒙消失以后，左翼青年的最终归宿变成了还房贷和车贷，做一些事至少证明你真的试着抗争过。51 说了，这里不要键政，我后续也不会再回复任何信息，如果有人有法律需求，可以找我帮忙。”

“工号 52”的简评文章，以及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斗争愿望，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位“力所能及”仅仅限于对工人进行法律援助的“实际”工作者。列宁讽刺这些人一谈到自己就要在“实际”这个字上加上着重号。最初的两步，终究会迈出去。而这两步之后的其它步骤，从政治报到建立工人政党到群众性的鼓动直到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危机时的武装起义，终究会到来。只有“空想”，只有“键

政”，这一切才能开始。“实际”给予工人的是那碗要求放弃长子权的红豆汤。我们从“空想”与工人接近开始，通过各小组互相接近并建立给予工人全面政治教育的革命政党这些让黑帮都为之惊讶的“键政”，尽全力让工人理解并争夺自己在历史中的长子权。正如列宁所说：

“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者同完全不关心理论的态度相结合。”（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73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列宁道路》崇拜“绝对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总是要“辩经”并且总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去实践。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有无限的信心，相信按照这个“经”一定能结束目前这个尚未普遍迈出初始两步的时期。毕竟，“经”不同，“力所能及”的“力”也会很不一样。